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学术丛刊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Monograph Series

英属以前彭亨华人史记：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

Notes on Pahang Chinese Before British Colonial Influenc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Docu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itime Economics and Trade

王琛发

Ong Seng Huat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学术丛刊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Series of Monograph

英属以前彭亨华人史记：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

王琛发

中国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
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

Notes on Pahang Chinese Before British Colonial Influenc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Docu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itime Economics and Trade

Ong Seng Huat

Provincial Endowed Academic Chair,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韩大学术丛刊第一册 HCUC MONOGRAPH SERIES VOLUME 1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学术丛刊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Series of Monograph

Editorial Committee

丛刊编辑委员会

Advisors

Dr Beh Kok Hooi
Prof Dato' Dr Teng Tjoon Tow
Jenny Khoo Gim Hoon

顾问

马国辉 博士
邓俊涛 教授
邱金云

Editorial Board

编辑委员

Chief Editor

Dr Yeoh Kim Chuan

主编

杨金川 博士

Deputy Editor

Dr Jackson Loke Soo Ling
Dr Jocelyne Lee Jia Lin

副主编

陆思麟 博士
李佳凌 博士

Publisher: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Tel: (+604) 2831088 Fax: (+604) 2829325

Email: hcc@hju.edu.my

Address: Jalan Lim Lean Teng, 11600 Georgetown, Penang, Malaysia

Date: October 2022

e-ISBN 978-967-17212-9-2

All right reserved

我仅仅是希望以我个人的观念，通过自己有限的力量，把一般人都能检阅得到的各种语文文献互相贯通起来，按照着时间顺序去排列，由此便能回归起点，落足在长时间的历史和跨地域的文化，去阅读这个地方曾经面向着大海洋时代的一个又一个历史片段。并且，我是想要寻觅古人的声音，聆听他们历代相续，身处在长时期的历史和跨海域的环境，是否存在着一种精神的贯通性，贯通在多民族交流互鉴的各种演变情境之中。我是想着要从连贯着这些片段的内容，去认识它们的呈现表述方式，考据与诠释它们互相之间的贯通与变化，从而理解所有这些文献原本的来龙去脉。我不一定需要每个人赞同，可是我是真切的在思考，以对话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甚至不同立场的文献，感受着它们相互之间的对话，于是我就可以从中试图解释里头的“人”，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历史中生活与思考。

我觉得们现在还有必要进行许多基于细节的重新解读，是因为我们需要回头反省一切可能的虚妄，以寻求通盘的理解，思索我们现在正在延续的过去是种怎样的存在。这不止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先人，为了子孙。由于思想，我们存在；只有继续的思想，直透那些导致历史虚无的本质，破除一切原来属于意底牢结造成的桎梏，我们才可能不断去发现自己本该如何存在。

作者识

目录

一、引言	1
二、从 William Linehan 《彭亨史》回顾古代史料.....	6
三、明朝海上交通文献留下的彭亨印象.....	16
四、14 至 17 世纪屡次毁于战火的海港王城	25
五、19 世纪北根华人乡镇和东北矿区的劫后复兴	36
六、彭亨华人甲必丹的战乱历史与残破记忆.....	48
七、19 世纪末英方介入以后有待重构的历史叙述	67
八、后语	80

一、引言

“彭亨”在南海交通历史上，是历代各国航海者较熟悉的地方。中华历朝各地港口，大凡有商旅或舟子出海航行，帆船不论南下北上，都得服从自然规律，因此各地船舶出入南海各处，特别航行西洋沿线的，常有往来或途径此地；而南下者为了等待季候风向北归，往往就得停留在在此处古代海域邦国，在彭亨或邻近其他港口上岸，居住数月，休息生养。久而久之，各国各地先民来往此地渐多，对当地风土人情，也就印象愈加深刻，甚至记载下当地相遇各国人事与物产的事迹。特别是人们屡次出海，都曾居住或经过彭亨，来路去处常会提起此处地名，所以不同时代的先民，也都会使用各自的语言，音译现在英语继续使用的“Pahang”名称；而历朝中华先民，也曾经根据各处地域的汉字方言，以不同腔调，翻译出多种不同汉字拼音的地名音译，其中“彭亨”两字最为普遍，至今通用。而此邦的汉字名称翻译，长期无从一致，其牵涉的时间超过千年，已足以证明中华祖先自古不会感觉此地陌生。正如 19 世纪以撰写《天地会》闻名的荷兰汉学家施列格（Gustaaf Schlegel）撰写彭亨古代史时所见，至迟从五代十国开始，一直到清朝为止，现在通用的“彭亨”一词，便是屡屡出现在航海记载，而且是因着不同年代不同籍贯航海者的发音差异，出现过不同的音译名称。施列格在 1899 年发表彭亨国史的考据文字，刊登在西方最早汉学刊物《通报》第十辑。^①他在文中也很早有发现，历朝中文文献对于彭亨的认识，是跟随着人们的经历出现不同的记载，因着此处海上贸易内容的演变而演变；经验和认知不同，也就造成历代叙述的内容各有差异。

作者简介：王琛发 (Ong Seng Huat)，男，马来西亚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嘉应学院“广东省海外名师”特聘教授，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南海华人历史文化与聚落研究，思想史/观念史研究。

^① Schlegel, G., 1899. Geographical Notes. Cordier, Henri (ed.), T'oung Pao ou Archives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 l'histoire, des langues, la géographie et l'ethnographie de l'Asie Orientale (Chine, Japon, Corée, Indo-Chine, Asie Centrale et Malaisie), Vol. X., Leiden, E. J. Brill, pp. 39-51.

彭亨港口过去历久不衰，也是得力它位处南中国海西部，相应于顺风相送年代的地理优势。如果从地图查阅，此地称为“北根”（Pekan）的老城，其周遭海岸，直至 19 世纪依然是个帆船密集的海港区域。北根港口位于海域西面的地理位置，正好坐落在古代南海西洋航路南部沿线的中途，恰恰就在马来亚半岛东岸中间偏南方，向东是婆罗洲，西南接近爪哇，沿着内陆河道走陆路，数日可达半岛西岸的马六甲等地，或西渡苏门答腊。

“北根”事实上是个中文音译，这两个音节的马来语原文，本是 Pekan，意思即是“市镇”。在清代以前民众的历史记忆，彭亨这座“港口城镇”，即“本邦”主要地理疆域，构成国土对外经贸文化交流的主要范围，也是协调境内边缘地区的枢纽，国主政事亦居其中，所以“北根”按华人传统概念，即《左传》《春秋》所谓的“王城”。过去宋元明文献只说“彭亨”，没有提到“北根”，到达北根就是抵达彭亨；而在明朝张燮的《东西洋考》，只是直称此地以一个“城”字，亦是如此理解。^①人们从各处航行而来，抵达彭亨河外的海港，循着河道逆水行舟，上了岸进了城，就已经是身处在本邦最繁华的地理中心。

回顾历史，由唐朝至宋元明清，华南一带的老百姓，随着造船和航海科技的提升，也就有了更多冒险出海的本事，构成民族祖先自古参与南海多民族文化交流，兴旺南海交通贸易的本钱。历朝各民族舟子海商，不单是常来常往大陆本土与南海诸邦，他们为了帆船必须依靠季候风，更常有根据季风的变化，年年都得南北两处定居。所以，中文文献早在唐朝以前频频出现“彭亨”这处海港口城邦名字，元明文献早有商旅舟子定居的记录，除了帆船航行时间必须服从大自然的季风气候规律，港口在南海的地缘优势是主要原因。

南宋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成书于开禧二年（1206 年），本书卷五就有说过，宋朝的福建市舶司，大凡所管理的船舶有前往南海诸邦的，都说是“候南风则回”。^②这或能反映当时海贸生活的真实面。所有出港帆船随着季候风相送，南下诸国；一旦到达目的地港

^①【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77 页。

^②【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153 页。

口，都得入港停留，在当地流连数月半载，等待向北回航的风季。不过，正如上说，彭亨有华人居住谋生，年年轮流往来居住在华东南和当地两处家园，必须随着风季长居彭亨港口长达半年，或期间往来邻近各地经营买卖，还不单是季候风与帆船技术相互关系的必然影响。这背景是海贸优势的客观环境，商人要交易中中原与南海货物，各处有利可图，就得尽可能拉长每趟停留的时间，尽量卖完带去当地的产品，也尽量收集最多当地的资源，以备回程转销。由此，历朝中文文献出现过不同翻译的“彭亨”发音，往往伴随着当地经贸资源的记载，而不同时代又会重视不同类型当地土产，这便足以表达在不同年代曾经有过不同地区先辈前来彭亨开拓经贸，或开发海陆资源，各自以本身的海上经历融入感受此地风土民情。南海各族先辈也是因应着经贸往来和互通有无，奠定了可持续的文化交流与共荣共存的基础，共同见证彼此就是这片海域自古存在的多民族生存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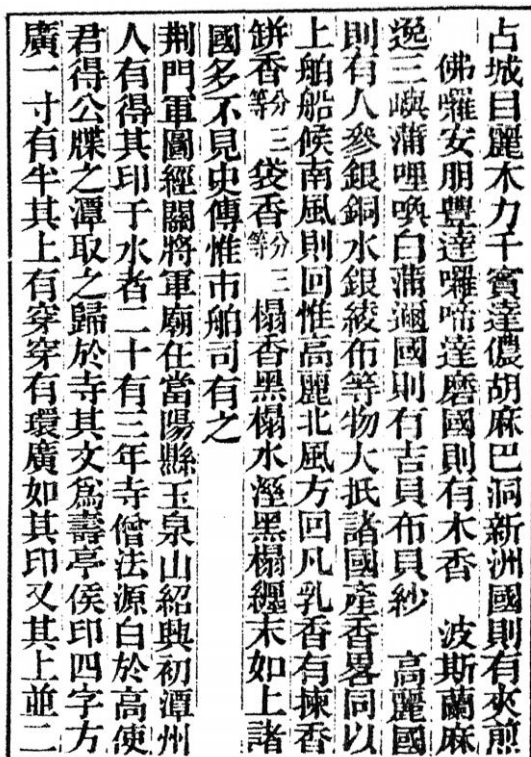


图 1: 《云麓漫钞》节选

诸种中文文献之间，唐代以前的《宋书》最初是称此地“婆皇”，后来的《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则采用同音异字，而作“婆风”。以后，彭亨在宋朝时期演变为三佛齐的属邦，国邦依旧沿用旧名，但是宋朝赵汝适在《诸蕃志·三佛齐国》的内文，是翻译作“蓬丰”。而在《云麓漫钞》当中，赵彦卫提及了“朋丰”，也是指彭亨。再到元朝，民间经贸航海家汪大渊撰稿《岛夷志略》，以及接下去明朝郑和的随员费信撰写《星槎胜览》，则都是把本邦的国名翻译为“彭坑”。还有茅元仪的《武备志·郑和航海图》，则是为了要强调其港口性质，写作“彭杭港”。只是，此前元朝《大德航海志》使用的“彭亨”两字，应是元明以来最常见译名。^①但是，如果按照一般研究明史都得翻阅的《明实录》，洪武时其实初称此地为“溢亨”，是永乐朝以后才定为“彭亨”。《明实录》、《星槎胜览》和《武备志》对同一地名各有译词，足以反映中华历朝常有船舰往来彭亨，同时期也会有分别来自不同籍贯和说着不同口音的先人，各自下海出洋，而且都是接触过彭亨，双边海岸互市络绎不绝。

如果根据元明时期的《岛夷志略》、《顺风相送》、《东西洋考》等书，这些书的记载，多会偏重彭亨的地缘位置，视为商旅舟子停泊帆船以及上岸居留的港口。所以彭亨港口也是华船到达南海的西洋以后，重要的中转港；一旦南下大船停泊在靠拢彭亨西岸的海上，人们又能从彭亨港出发，使用当地小船出海，借助小范围海域的海流和日夜风向的变化，来往贸易于海域诸邦之间。汉文记述彭亨，除了多会重视彭亨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货殖物产，也就多会记载彭亨来往他国日程，以及彭亨的各国关系，等等细节。到18世纪以后，彭亨此时国境的地理形势演变，正如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所说，是深入至半岛北部的大片山区，沿山相续连接着彭亨东北部的暹罗属马来诸邦；而清朝谢清高《海录》也因此看到明清以来的彭亨版图，其北方的地理形式主要是山区，连同着山区拥有大量矿脉资源，影响了清人进出彭亨的方式。到了清朝。华人出入

^①【元】汪大渊撰，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7页。

彭亨，不一定再要如前人一般采用彭亨港口，那些要进去金矿区的，反而是从邻国登加楼的港口上岸，从陆路走入彭亨境内更方便。

宋元文献会和清朝文献之间出现差别，清朝华船前往彭亨会使用宋元文献不曾记载的新兴登陆地点，其背景主要还因彭亨此时和西方各国经济有了愈来愈多的关联。自欧洲重商主义崛起之后，欧洲长期拥有黄金需求，而彭亨北方山脉的金矿区，此时正当兴盛。所以清人相比起前人，入境彭亨的目的地有了差别，那些想要去北半部山区的，就不见得像前人一样会航向距离山区遥远的彭亨南方港口，在北根登陆。不同时期的汉文航海交通文献，上边可能出现寥寥数字的细节差别，其实就能反映一般不应忽略的常识议题：华人在彭亨的历史，是属于彭亨历史的一部分，没有离开过世界的经济历史，是全球经贸趋势演变呈现在马来亚东岸的进程。

上述各种中文文献，虽然记载过历代彭亨风土人情和物产特征，可是记载古近代华人在彭亨境内生活的内容情况，一般并不多见。不过，至到上世纪，自英国人 W. A. Linehan 撰写《彭亨史》（A History of Pahang），后来还有许多西文或者马来文的历史撰述，都总结过好些讨论彭亨的中外文史料，其中有些文字提及古代商旅舟子在彭亨的情况，也不乏一些文字提及 17-19 世纪彭亨境内华人。另外，还有一些新的材料，源于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是有文物可供考据说证。这包括 2020 年 11 月 14 日，在彭亨第九任州务大臣莫哈末朱索位于老北根（Pekan Lama）的故居前，意外挖出了九块清朝墓碑。

根据刘崇汉的《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他在 1990 年代访问北根华人伯公庙时，除了见过庙中原有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大唐本头公”牌位，还见过一些嘉庆年间文物，同时也发现那时庙前墓碑林立，有些墓碑刻着嘉庆年号。^① 2020 年发现的这些碑记，相比起刘崇汉在 1992 年以前曾经见过的，不算太古老，重要的是其中有甲必丹的墓碑。若把这些材料集合在一起，以北根先后发现的木石刻遗物进行内外部考据，特别是参照各种海洋交通文献，尤

^①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 年，第 141-142 页。

其不能忽略像《顺风相送》这类古代航海工具书，从多角度的相互解读，也许能看出许多前人未曾重视的事情；这对于进一步理解 17 世纪以前的彭亨华人历史，以及彭亨的海上交通与经贸，特别是继续理解客家和潮州群体 18 世纪以后在彭亨境内的港区和矿区的互动，都会较有参考价值。

二、从 WILLIAM LINEHAN 《彭亨史》回顾古代史料

W. A. Linehan 长期生活在英属马来亚，服务于殖民地官僚系统，从 1931 年至 1937 年曾历任英殖派驻吉兰丹与柔佛两邦的署理顾问官，1938 年出任海峡殖民地教育厅长兼马来联邦教育顾问，以后 1948 年退休后又于翌年返聘为马来亚博物馆馆长，一直到 1951 年方才任上离职；回到英国；以后又于 1955 年出任剑桥大学东方语言研究助理主任，直至当年 10 月离世。^① Linehan 的《彭亨史》正如他其他的文字，都是依靠本身有过丰富的历史文化学养，借助长期担任英国驻马来亚官员的资历和方便，力图综合各种可靠的一手材料，客观详尽记述当地的民族志，确保丰富大英帝国当时的东方研究，完善帝国学者官僚对马来亚各属邦的当前和未来理解。姑不论 Linehan 的官方立场，他的《彭亨史》可说是资料详尽，是上世纪初西方人撰写过的最完整的彭亨通史。《彭亨史》的序言，首先便引用了不同族群的传说，可谓是各有各说的解释着“彭亨”（Pahang）得名的来由，由此无疑也能反映彭亨自古便是多元族群。不同的族群，各自解释历史上共同的生活环境，都不可避免会继承族群祖先流传的集体叙述，偏向以本身作为主体的那部分记忆。

《彭亨史》除了记载着中国人曾经按照古代语言发音的音译，称呼当地为“蓬丰”，也引述了阿拉伯和欧洲人对“彭亨”有过的不同称谓，如：Pam、Pan、Paam、Paon、Phaan、Phang、Pahan、Phaun、Pahangh。在 Linehan 看来，这些西方与东亚各国都曾经各自以本国文字对译此地地名；他们在发第一个音的声母时，不论是以

^① Who was who 1951-1960.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61, pp.663-664.

清或浊的双唇音发音，显然都是外来者在使用着音译。而 Linehan 议论此地名称最早缘起，则是并列了他认为最早在当地内陆活动的三个族群，即吉蔑语系的古暹人（siam）、耶坤原住民，以及马来人，以对比这三个族群的各说各理，寻找“彭亨”地名的最早渊源。Linehan 说：根据古代吉蔑（Khmer）语系的发音，“彭亨”（Pahang）本来古代也如现在的英文发音，是一个完整的词汇，即“锡”的意思，由此也便能对应吉蔑人的记忆，即当地的林明流域（Sungai Lembing）一带本来是古矿区；可是 Linehan 也关注和转述了 Bebar 地方上的耶坤（Jakun）原住民记忆，认为“彭亨”（Pahang）本来的发音，源自原住民祖辈称呼此地“Mahang”；而马来人则说，彭亨河流域，河流分支的河畔有个村子名叫 Kampong Kemanmang，对面有棵大树属于 Mahang 树种，他们的古代先民为了方便记忆地点，便以地标的树名作为地方名称，后来演变为地方上的马来人习惯唸成 Pahang 发音。^① Linehan 还提及，彭亨在 1454 年成为马六甲王朝属国以前，原来便是一处古代城邦，在梵文文献的名称是 Inderapura。Inderapura 的称谓取名自“Indera”，即古印度神话所谓的众神主宰“因陀罗”，或后来佛教演绎的天界主帝释天，而梵文 Pura 则意味着“汇聚之处”或者“城邦”，由此可推论，古代彭亨是类似古印度的城邦形态国家，其主要领土几乎是重叠着一座海港城市的整体地理范围。当然，Linehan 也意识到，彭亨称为 Pura 的实质统辖范围，不等于后来彭亨王城首府北根（Pekan），应是大于后者在马来文概念中的所谓“市镇”的意义。^② Inderapura 的领土，当时应是已经包括海港周遭许多乡镇聚落；彭亨国主的天命，即是统合着所有乡镇聚落的领主或头目，以社会一体而经济共生。在古印度经典《梨俱吠陀》（Rigveda），因陀罗被视为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神，手握雷电为武器，传说中他是主宰雷电、气候、雨水、河流之战神，曾经杀死了延续季候旱灾的修罗天龙，让阳光和雨水解救人类；不过，在吠陀时代以后的印度神话，因陀罗的神圣

^① Linehan, W., 1936. A History of Pahang.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14(2), p.2.

^② Ibid.

故事就褪色了，反而多了许多神明由于七情六欲导致的错失。^①彭亨最初以因陀罗名字称城邦之名，想来亦是息息相关彭亨河港口的民生经济。当地老百姓是年年依赖季候风演变迎送帆船，又得担心风灾水灾。

彭亨以后，自从 Pura 转借成为马来语，这个梵文词汇在本区域的使用历史也是源远流长。至今，新加坡作为现代城市国家，国歌以马来语唱出的国家名称 Singapura，即是新加坡古代历史上本来的国家称号。按照梵典的文化传统，狮子（Singa）是为瑞兽，Singapura 意味“狮子城邦”。

Linehan 叙述彭亨历史，较少引用中国的历朝史料。可是，追溯早期西洋作者引用过的中华典籍，各家讨论过彭亨的文字不多，最早文论可能出自荷兰的施列格（Gustaaf Schlegel）。施列格于 1899 年在法国《通报》第十辑发表的南海诸国《地理志》，其中的第 iii 篇和第 iv 篇是在论述马来亚半岛上彭亨和柔佛两个古国，使用的古代历史材料，主要都是引用中华历朝文献；其中除了提及清代《续文献通考》说过彭亨又称“暹罗迤西”，也引用了《明外史》和《东西洋考》等书，考据出在明神宗年代的彭亨与柔佛关系，古柔佛国不止一次军事威胁彭亨。^②

根据中华先民“下西洋”的观念，彭亨位处西洋海域，由暹罗航路的南下，北根王城向东则接近对岸婆罗洲、偏东北则往菲律宾、向南是爪哇大岛诸港口，从陆路西进可到达马六甲海峡东岸大小诸港。施列格使用的汉文史料，重视详细记载彭亨和各邦的恩怨关系，或能折射出彭亨历来局势，都会影响历朝遍布南海各地的华人船主海商，相关彼等长期海域生活的经济利益与谋生安危。在 15 世纪以前，船舶主要都是沿岸航行，此处地理位置也确实比南方的柔佛更具优势，更方便通过陆路运输各种物质来往马六甲海峡东岸，节省许多时间和交通成本。在这里的交易的各方货物，有的来自南中国海以北、以南、以东，也有从马六甲海峡上岸后通过陆路

^① Berry, Thomas.,1996. Religions of India: Hinduism, Yoga, Buddh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0-21.

^② Schlegel,G.,op.cit.

运往北根等处的；帆船到了彭亨海岸能不能安全停泊，当然不止是牵涉成本预算，还是件生死大事。

Linehan 以后，G. R. Tibbetts 在 1956 年撰写的《阿拉伯，地理家认识的马来半岛》，引用了 Muruj al-Dhabab 撰写的阿拉伯文字，是 Linehan 昔日未曾引用过的；^① 再后来又有一位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考据 1500 年以前的马来亚土地，是引用阿拉伯旅行家马素地（Masudi）公元 943 年撰写过的同类文字，讨论了古希腊人关于《黄金半岛》的概念。^② Masudi 昔日东游，旅游了遍属于古代三佛齐（Sri Vijaya）王朝的跨海版图，曾经注意到半岛海滨有一处地方名叫 Fanjab，其内陆领地拥有产银、产锡也产金的矿区，相邻着半岛西边的吉打王国；而根据 Masudi 的说法，只要有外来船只到达当地，就会遇上当地模样奇特的卷发人群，持着毒箭，扒着小船上前包围，把来访的客船困在海中。^③ 现在看来，Masudi 文中所指的这些彭亨武装船民，当是来自耶坤族，即地方上称为“海人”的部落。按照 G. B. Tibbetts 设想，Fanjab 应该是 Fanhan 的音误，即“后来”华人用汉语翻译的“彭坑”（Peng-keng）。^④

古代海上丝路，各地贾船相互转致，端赖沿线港口互通。唐宋既有阿拉伯人留下了彭亨与中国诸港口的航行记录，同时代的中华海商更不可能不会熟悉这处海域相连的地方。据 Paul Wheatley 引用“*Akhbar As-Sin Wa'l-Hind*”（《中国与印度的消息》）等阿拉伯文献的记载，公元 11 世纪的彭亨沿海，还有些“彭亨人”环住在刁曼岛（Pulau Tioman）等诸岛屿上边。那时正值宋朝，刁曼岛这处彭亨王城港口东南处的岛屿，是帆船来往柬埔寨补充淡水的中途，也是商船交易檀香木、白米的地点。^⑤ 刁曼岛地理位置在彭亨河出海的东南边，帆船经过岸边的海域，如果不是驶向彭亨王城北根靠港停泊，只是想要取道北上柬埔寨，或者南下新加坡以南，刁曼岛西部

^① Tibbetts, G. R., 1956. *The Malay Peninsula As Known to the Arab Geographer*.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Vol. IX,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p. 25-28.

^② Wheatley, P., 1961. *The Golden Khersonese*.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p. 247, p. 228.

^③ *Ibid.*, p. 38, p. 228.

^④ Tibbetts, G. R., *op. cit.*, pp. 38-39; Wheatley, P., *op. cit.*, pp. 228-229.

^⑤ Wheatley, P., *op. cit.*, p. 229.

海湾，便是极适合船舶中途避风之处，或者派人登陆汲取淡水储备；而上世纪屡次的刁曼岛考古，更是一再发现岛上的人类居所痕迹，出土过大量宋初广东产瓷器碎片，证实了本岛宋元以来船来船往，并且至迟在宋代便已出现大片面积的人类居住区域。^①

但是，西方人引用古代中文文献，首先遇上的考验是汉字自身的历史演变，遇上不同的地方或年代，都可能出现读音或文义上的变化。如“彭坑”的“坑”，以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发音当然是唸作“Keng”，只有回归向上述刁曼岛发现的宋代瓷器来源地，使用当地的华南广府方言发音，才会迄今依然唸成“Hang”。而 Linehan 使用中国史料讨论彭亨古代史的时候，主要是采用了《明实录》和费信的《星槎胜览》。他在文中有一大贡献，是采用那时明朝官话的中文音译，重新对照了彭亨历代统治者的名号，设法还原这些马来文发音的原意，由此便能更清晰解说古代彭亨领土上边的地理状况和乡土人情。^②

《明太祖实录》卷 121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丁未”条记载说，“湓亨国王麻哈刺惹达饶”曾于洪武十一年（1378 年）遣派使臣，向明朝奉献金表，贡番奴六人，胡椒二千斤、苏木四千斤，另外还有檀香、乳香、片脑等各种香药，^③ Linehan 便是据此说，对照着彭亨当时是跨海从属于满者伯夷（Majapahit）王朝的城邦形态国家，论证彭亨统治者的称号，读音应是源于梵文“Maha”（大）和“Raja”（土邦国王），由此而合称“Maharaja”（大邦国王）；再配合着“达饶”应是马来文“Tanjung”的汉字音译，本意应是海岸线之间向着海洋突出的那片陆地，由此便推敲当时彭亨统治者的称号，是要表述本身的领土范围掌握着彭亨河口流域的海岬地带。^④因为大凡海岸线越有大片突范围，其内侧即是天然的避风港湾。其实，Maharaja 在梵文意味着“大王”，当“大王”把握着港口和富

^① Kwan K.K.& Martin,J.,1985.Canton, Pulau Tioman and Southeast Asian Maritime Trade, in Lam,Peter,Y. K.(et.al.) A Ceramic Legacy of Asia's Maritime Trade. Kuala Lumpur: Southeast Asia Ceramic Society, West Malaysia Chapt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49-63.

^② Linehan, W.,op.cit., pp.5-7.

^③ 【明】姚文广、夏原吉监修：《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校勘本，第 1964 页。

^④ Linehan, W., op.cit,p.6.

庶地带作为都城，其底下应该还有许多通常翻译作“小王”的附属或者同盟的土邦领袖，又或者实质上便是管理国王属下各处领地的“土酋”。这种“大王”“小王”的说法也常会出现在中国历朝的佛经翻译。而证诸中文文献，彭亨的情境也确实不离此说。明朝张燮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成书的《东西洋考》，书中“彭亨”条便提及说：“金山：其上出金，有大酋守之，日遣百余人采取，月进王二十金。”^① *Maharaja* 这个名词，后来还曾经继续被马来西亚各州统治者沿用，但已经不一定有实质封邑，只是作为一种赋予王室成员的荣誉称号。

另外，Linehan 引用的其他文字，也提及满刺加（马六甲）王朝开国国王的名称 *Parameswara*，可能是满者伯夷王朝赋予公主、郡主或女王夫婿的“亲王”封号，由此试图解释《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十二年（1414）遣使明朝的彭亨统治者名号，何以会名叫“巴刺密锁刺达罗息尼”，前边数个字的发音，与满刺加国王名号雷同。^② 翻查《明太宗实录》Linehan 引用的彭亨统治者名称，其实源于记载在卷 154 的“永乐十二年秋八月甲寅”条。Linehan 认为，“巴刺密锁刺达罗息尼”的名号，源自于明人把原本的两个名词用汉语结合在一起音译，前边使用的“巴刺密锁刺”称号，很有可能本来一致于《明实录》译称马六甲开国国王为“拜里米苏刺”的原意。但 Linehan 考据彭亨国王称号后边的“达罗息尼”四字，则是根据马来人称呼海湾为“Teluk”，还有当地人至今将距离彭亨河口四十里的名高山、大湖、泉源和村子命名为“Chini”，视为灵兽白鳄鱼守护邦国的神圣基地，由此推论《明实录》所说的“巴刺密锁刺达罗息尼”意即是“青尼海湾的亲王”。^③ 而 Linehan 接下去的重点是引用了费信的《星槎胜览》，对照葡萄牙人 Godinho de Eredia 由马六甲陆路以六天行程进入彭亨的游记，^④说明那时彭亨作为一个海域城邦

^①【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8页。

^②【明】张辅、蹇义、夏原吉监修：《明太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776页。

^③ Linehan, W., op.cit.,p.7.

^④ Ibid., p.1.

形态国家，领土范围主要是的海边平原地带，背后还有群山围绕，以山后拥有丰富的金矿矿脉，吸引各国商贾纷纷前来交易买卖。^①

Linehan 行文中，另外也引用了 J. V. Mill 在 1930 年翻译葡萄牙人 Godinho de Eredia 的游记。J. V. Mil 根据 Godinho de Eredia 这份 1613 年的文献，是把彭亨统治者的身份英译为“permicuri”，^② 音意接近当时海域通用梵文 Pramaishwari 的原本含义，意味着“女主”。Godinho de Eredia 并且推测，满刺加王国崛起以前，彭亨是继承着北大年，第二个出现在半岛的马来邦国，作为半岛最大黄金产地，很早就古希腊强盛时期，和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发展了双边贸易关系。^③而且，按照 Godinho de Eredia 的听闻，彭亨在归属马六甲王朝之前，曾经被暹罗纳为藩属，当时彭亨 permicuri 也还兼管北大年，又称呼半岛南部为“Ujungtana”（土地的最尾端），任命居留在新加坡的港城事务大臣（Xabandar）掌管关卡财务。^④这正可以对照汉文翻译“巴刺密锁刺”的原意，意即其统治者并非源自所属王朝的本源世系，而通过婚姻成就身份的“郡王”或“亲王”，亦即“permaisura”一词的意义。现在马来西亚联邦诸王室之间，依旧是有沿续过去历史的，还是以“permaisura”称呼亲王，以“permaisuri”称呼王后。如此记载足以反映，不同时代的彭亨版图各有差别，不同时代的彭亨华人，是活在不同具体时间的边境范围。

相对于明代文献，值得注意的是元朝汪大渊撰写的《岛夷志略》。Linehan 的《彭亨史》只是在第二章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提到说《岛夷志略》提及了“彭坑”，另外就是以加了个“？”再引述前人，说道《岛夷志略》提起过“八都马”，或即是刁曼岛。^⑤现在看来，《岛夷志略》提到说，在“八都马”当地另有酋长，这和阿拉伯记载“彭亨人”环住群岛，内容是互相有些差距；而且，当书中说及“八都马”此地“地产象牙，重者百余斤，轻者七八十斤”，^⑥ 这不论在刁曼岛考古或历史研究，甚至岛上先民记忆，印

^① Ibid., pp.7-8.

^② Ibid., p.8.

^③ Ibid., p.7.

^④ Ibid., p.8.

^⑤ Ibid., p.5.

^⑥ 【元】汪大渊撰，苏继庾校释：《岛夷志略校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0页。

象都是大有距离。而 Linehan 可能阅读过伯希和等人诠释《诸蕃志》地名，受着影响，所以倾向将《岛夷志略》也有提到的“单马令”，视为彭亨现在首府关丹的河口港湾，这其实也并非定论；这在后来苏继庠校释的《岛夷志略校译》其实另有讨论，指出单马令应该是古代的另一处海域城邦，地点大致位于现在泰国的六坤一带。^①

汪大渊撰写《岛夷志略》的知识基础，在于他曾经在 1330 年和 1337 年两次随船出行，亲自漂洋过海，将所见所闻于至正九年（1349 年）定稿，总结在《岛夷志略》。因此汪大渊书中说南海诸邦，包括描写彭亨本来是金银矿原产地，记录地方的常民风俗，多是在叙述本人亲身见闻。例如他记载当地的金银消费习俗：“富贵女顶带金圈数四。常人以五色焞珠为圈以束之。凡讲婚姻，互造换白银五钱重为准。”^② 在汪大渊撰述《岛夷志略》的年代，他那时印象中的彭亨，就是臣属三佛齐的跨海邦国，因此提到当地统治者，是从华人对待地方统治的概念去说，说道当地“有酋长”。^③

以汪大渊的印象对比彭亨境内考古发现，汪大渊对彭亨的认识，可谓源于由宋而元的海域印象。他重视当地“有酋长”，是很重要的线索，这足以说明当地有社会、有居住聚落组成的古代村镇，也有商业秩序，包括处理邻近海域船来船往的贸易活动。正如上说，阿拉伯人早就记载过，彭亨的外岛刁曼岛，一度是来往阿拉伯与中国的中途岛，当地在 1961 年至 1980 年代初的几次考古活动，特别是在 1970 年代上半叶有过大规模发掘，发现过先民的垃圾场以及厨房遗址，在岛西部的出土文物就包括了宋初广东瓷器，南宋至元代的江浙与福建瓷器；以后在其他地方，又发现有明代江西景德镇与汕头的瓷器，还有晚清中泰两国和欧洲流行的娘惹或西式瓷器。^④由此可知，古代彭亨沿海确有宋元商船停泊遗迹，其中包括刁

^① 同上注，第 79-83 页。

^② 同上注，第 96 页。

^③ 同上注。

^④ Kwan K.K.& Martin,J.,1985.Introductions to the finds from Pulau Tioman, in Lam,Peter,Y. K.(et.al.) A Ceramic Legacy of Asia's Maritime Trade. Kuala Lumpur:Southeast Asia Ceramic Society, West Malaysia Chapt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69-70.

曼岛西部避风港湾，岛上有源泉可供来往船舶取水。刁曼岛上考古发现的那几处历代居住区域，很可能印证上述《云麓漫钞》的记载，即是那些“候南风则回”的海商舟子遗迹。

倘若再以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的内容，对照明朝张燮撰写的《东西洋考》，《岛夷志略》提到宋元时期的彭亨物产和入口需求，是说彭亨“地产黄熟香头、沉速、打白香、脑子、花锡、粗降真，贸易之货，用诸色绢、闾婆布、铜铁器、漆磁器、鼓、板之属”^①；而到了张燮在明朝万历年间撰写《东西洋考》，张燮则是把“沙金、犀角、象牙、鹤顶、玳瑁、花锡”^②名列前头。如此对比彭亨在元明两代对外出口，可知自元朝顺帝至正年间到明朝神宗万历年间，历史经历了近三百年演变，彭亨本身领土疆界早从城邦形态拓展至周遭各处领地，古代各国民众生活要求越趋丰富多样，彭亨向外出口名贵物产种类愈多，黄金和象牙等并非日常必要的商品也就愈加有机会成为大宗外贸内容。由汪大渊到张燮，后者的记载已经加添说，彭亨原产的速香、片脑、胡椒等物，都属于大明王朝的“本朝充贡”^③名单，足可佐证此处是南海华人常来常往之地，否则也难以如此详细记载由民间到官方的买卖贸易诸物。

再者应看《顺风相送》。这部南海航路指南，是 Schlegel 以至现代作者在讨论彭亨古近代史时候，较少会有人引用的文献。可是，《顺风相送》恰恰是一本重要的航海技术指南书册，记载了各国帆船来往中国与南海各港口的的主要使用航线，也记载了南海航道沿线的各处地标和港口名称；而且《顺风相送》还特别标注好几处可供人员与货物集散的大港，也即是沟通邻近地区的居留港口，其中对于彭亨港口，就做了相较他处详尽的记载。

《顺风相送》的第一篇文字《地罗经下针神文》，文中尊称妈祖神圣，是采用了元代封赐妈祖“明著天妃”的尊号，而不是采用明太祖一度复奉的宋朝“灵惠夫人”封号，也不是采用明朝永乐七年（1409）以后改称的“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但文中又有句子提到“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如此足以说

^① 同上注。

^② 【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9页。

^③ 同上注。

明其中文字很可能最早源自元代传抄版本，经历过屡次增补，内容总结了明朝以前直至永乐朝以后的航海知识，一路流传民间，到明朝方才完成现在阅读所见的整体结构。^①由此亦不难理解，《顺风相送》在民间流传，为的是应付海上的实用需要，里头提及南海诸邦的好些地名，就不见得会相同于《明实录》或其他官员文士的传世用词，而是大量使用闽南方言音译。由此或能反映这其中记载的航海经验，最初也是辗转流传于闽南一带的老知识。由于《顺风相送》倾向以闽南语音译地名，例如把“北大年”译为“太泥”，又或者是把“满刺加”译成“磨六甲”，其文字若是以方言读诵起来，就会更接近马来语的原文发音。而《顺风相送》的编排也体现出服务于航海实用的要求，首先记载和叙述各种观测天文天气的技术，还有辨认海路的方法，接下去方才说明要如何识别沿途朝向各港的山形水势，再到后头则是记载主要航路以及各分支航线，包括沿途地标各自的地方名称，以及它们之间的针向差距，由此造成的相应海路距离。至于《顺风相送》最能证明彭亨作为华人先民最熟悉的一个地方，又是古代南海交通重镇，就在于《顺风相送》内文记述各地港口航路，对彭亨港口是有特别关注。本书对于各地港口开船来往其他港口的海路距离和针向说明，包括指出沿途所见山形水势组成的地标，都是着墨不多，简单扼要；唯独是尾端文字以下，出现了“彭坑山形水势图”，并且对彭亨作出较多于其他港口的记载；尚且，这里边对待地名的称呼很不统一，似乎经历过不同时代传抄与增订，所以一会儿称呼“彭坊港口”，另一会儿又变成“彭亨港”。^②就在“彭坑山形水势图”后边，接着还记载了各处来往彭亨港口航线模式，其中有三处是直接对应彭亨港口的航路，如“太武往彭坊针路”、^③“赤坎往彭亨针”，^④还有“暹罗往大泥彭亨磨六甲”。^⑤那时，使用这些航行路线的船舶，既有随风南下，

^① 王琛发：《明清两朝妈祖崇祀的信仰面貌——以汉文历史文献的解读为中心》，《妈祖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第84页。

^② 向达编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6-47页。

^③ 同上注，第54页。

^④ 同上注，第60页。

^⑤ 同上注，第61页。

也有顺风北上的，都是根据风季出海。船上商旅舟人一旦到达彭亨，当然得在彼岸住一段时日，等待回航的风季。

回说 Linehan 的考据，他并未使用太多文字讨论彭亨在明朝以前的中华关系，但至少根据他的文字，可以发现早在明朝定鼎之前，彭亨在宋朝时候曾经是三佛齐的跨海属邦；再到元代以后，彭亨又是在在 1365 年之前便已经被满者伯夷纳入版图。^① 而彭亨历任的国主，在历史上既然曾经依附三佛齐或满者伯夷，承认彼等的宗主地位，又曾以号称“大邦国王”（maharaja）处身在海国城邦诸位小王之间，这历任统治者当中称为“permaisura”者，也就更有可能曾经具有三佛齐、满者伯夷或本邦的“亲王”身份，以此尊贵身世宣示宗主国必须认可彭亨相对自主的主权。可是，再等到满者伯夷在 14 世纪末失去对马来亚半岛的影响，彭亨政权面临着陆地相连暹罗，又得接受着后者的影响。

三、明朝海上交通文献留下的彭亨印象

晋朝以后，自《宋书》开始记载“婆皇”两字，由五代十国一直到宋元两朝，那些描述过“彭亨”的朝野记录，证实了华人先民自古生活在这片海域，从来不会感觉马来亚的半岛东面是个陌生的地方。在这些文字当中，如《新唐书》等，是源自朝廷使节来往记忆；像《云麓漫钞》和《诸蕃志》，是海贸事业官员留下的记录；也有少数如汪大渊撰写的《岛夷志略》，是源于民间航海家的亲身见闻。再到明初，像《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等朝廷正史，侧重的是使节和外事官员留下的海上消息和往来记录。这系列古代文献，虽然没有直接材料明文记载先民如何在当地形成若干聚落，但至少证明彭亨在 15 世纪中叶成为满刺加属国以前，即使是屡经风雨，也一再听闻中土改朝换代，双方依然朝野往来，无改海上交通传统，其中也有舟子商旅在当地经商居留。明朝定鼎，彭亨亦是最早遣使结交明朝的南海邦国之一。

^① Mohammad Yamin. 1948, Gajah Mata, Jakarta: Balai Pustaka, hlm. 54.; Wheatley, P., 301-302.

明朝时代的海上交通文献，例如其中张燮撰写的《东西洋考》，还证实了彭亨王国至迟在万历朝以前便设立了官方圈定的海商舟子居住聚落，那时各地华人到达对方港口，都能方便上岸长期居留。由此必然也会发生语言学习交流，就能留下更多各种风土人情、历史演变乃至经济活动的记载，可供后人参考。

根据《明太祖实录》，彭亨是早在 1378 年，正值胡椒和苏木市场价格堪比金银贵重，便曾在明朝初建时代遣使中国，上金叶表、贡献胡椒与苏木数千斤。《明太祖实录》卷 121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丁未”条，留下完整记载说：“溢亨国王麻哈刺惹答饶，遣其臣淡罔麻都等奉金表，贡番奴六人，胡椒二千斤、苏木四千斤及檀乳脑诸香药；百花国王刺丁刺者望沙亦遣其臣八智亚坛等奉金表，贡白鹿、红猴、龟筒、玳瑁、孔雀、鸚鵡、哇哇倒挂，及胡椒香蜡等物，诏赐二国王及使者金织文绮纱罗衣服有差。”^①而在《明太祖实录》卷 232 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庚辰”条，留有那年的“更定蕃国朝贡仪”^②记载，则提及彭亨等诸国蕃王常来常往参与朝廷活动，明朝政府为着安顿各国，便有规范“凡遇宴会，蕃王班次居侯、伯之下”，^③又确定“蕃国使臣及土官朝贡皆如常朝仪”。^④此后，再根据《明太祖实录》卷 254 “洪武三十年八月丙午”条，还可理解彭亨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是他记忆深刻的三十个亲近善邻之一。^⑤那时，明朝发生了胡惟庸案，消息出往各国，三佛齐其时也对明朝使臣起了异心，并且阻拦彭亨等国和明朝正常往来；当朱元璋接受礼部报告说明诸国“使臣客旅不通”，^⑥朱元璋还是会提起这些国家的名称，维持着友好的回忆，说道：“洪武初，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⑦到了明成祖朱棣派遣使臣下西洋，重新巩固明太祖先前奠下的南海关系，在《明太宗实录》直

^①【明】姚文广、夏原吉监修：《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校勘本，第 1964 页。

^②同上注，第 3394 页。

^③同上注，第 3395 页。

^④同上注，第 3396 页。

^⑤同上注，第 3671 页。

^⑥同上注。

^⑦同上注。

接述及鄭和奉命下西洋的十四則文字当中，其中在永乐十年（1412年）的一次记录，还有永乐十四年十二月（1416/17年）的另一记录，都是直接提及“彭亨”两字。^①

无论如何，回归至朱元璋本身留下的文字，他在洪武六年（1373年）颁布《祖训录》告诫子孙后世，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九月修定后再颁布，改名为《皇明祖训》，作为晚年定本，其〈祖训首章〉是把“彭亨国”的音译写作“湓亨国”，说“其國居海中”，并把彭亨归纳在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名单以内；但他也同时是把彭亨排列在“自占城以下諸國”的名单里头，说道：“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內帶行商，多行譎詐，故沮之。自洪武八年（1375年）沮至洪武十二年（1379年），方乃得止。”^②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文中会说“湓亨国，其國居海中”，这和后来《东西洋考》也说“彭亨者，东南岛中之国也”，^③都是在说着同样的道理，并非真的以为彭亨是海上的一座大岛，说的是彭亨在南海航路的地缘位置。

若参阅《明太宗实录》卷 154，按“永乐十二年秋八月甲寅”条，彭亨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再次派遣使臣北上明朝，此次使团还有外国人物相随，《明太宗实录》的表述是说：“彭亨国王巴刺密锁刺达罗息泥，遣使苏麻目门的里，及忽鲁谟斯国人己即丁等，贡马及方物，并赐文绮袈衣。命礼部赐彭亨国王锦绮纱罗彩绢，而酬己即丁等马值。”^④此外，在《明太宗实录》卷 182 和卷 183，也留下重要讯息，证实当时包括彭亨使臣在内，各国使臣北上以后都可能是长期居留；他们去当时称“应天府”的南京，在皇宫朝见明成祖，已经是在隔年，然后又是借助明年初南吹的风向乘船回程。《明太宗实录》卷 182 其中记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戊子朔”（1416年）的条文如是记载，当天是由“钦天监进永乐十五年

^① 许振兴：《〈皇明祖训〉与郑和下西洋》，《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 51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10 年 7 月，第 71-73 页。

^② 【明】朱元璋：《皇明祖训》，收录在[明]朱元璋：《明朝开国文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7 年，1588-1591 页。

^③ 【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77 页。

^④ 【明】张辅、蹇义、夏原吉監修：《明太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校勘本，第 1776 页。

《大统历》，上御奉天殿，受之，颁赐诸王及文武群臣”，而同一天“古里、爪哇、满刺加、占城、苏门答刺、南巫里、沙里、淳泥、彭亨、锡兰山、东留山……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宣慰司，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①，然后八天后的“丙申”条，提到当天丙申日举行使臣宴；^②再到“壬子”条则记载了明成祖当天冬至受朝，宴请群臣和来使。^③再后来是卷 183 的“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条，记载诸国使者及旧港宣慰使司臣在当天辞行，明成祖悉数赐赠所有使臣文绮裘衣，并派遣中官郑和等人，准备带着锦绮、纱罗、彩绢等物，陪同使臣回程，偕往赐送各国王。^④ 此处文字便很清楚记录，诸国使臣显然都是根据季候风的客观规律，在南京度过冬至。他们是要等到农历十二月，明朝已经准备好供应给各国的《大统历》以后，方才在永乐十五年（1417 年）的农历新年前夕各自整装，准备跟着郑和的船队，装满各国的礼物，一道出发。

没有历法就没有办事约定时间的标准和效应。《明太宗实录》里头记录成祖在年底分发给诸王和群臣《大统历》，是早在洪武朝就已经推广泽及海外。追溯更早的历史，明朝廷向爪哇“颁去《大统历》一本”，^⑤是洪武二年（1369 年）的事情。此外，朱元璋在明朝洪武六年（1373 年），也曾赠予真腊国《大统历》。^⑥ 明初颁行的《大统历》，是明朝廷编订的历法书，包括郑和等各路使臣和民间航行必备，方便日常履行各种事务的择日定时标准，分发给各国，更是互相计算日子和约定日子，为设置时间和预估航行气候建立共识，方便海上交通的相互沟通。明朝钦天监编订的这种立法，能够成为各国航海约定俗成的统一历法，亦足以确定古代丝路沿线的各国港口不是毫无预算的应付年年船来船往，这个海域在那时也是个汉语汉字广泛流通的世界。彭亨等地亦然。这或者也能说明，何以《琉球历代宝案》收录海域各邦文书，不单是汉字书写，并且常会以农历志明日期。

^① 同上注，第 1963 页。

^② 同上注，第 1964 页。

^③ 同上注，第 1967 页。

^④ 同上注，第 1969-1970 页。

^⑤ 【明】严从简撰、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292 页。

^⑥ 同上注，第 173 页。

就彭亨而言，彭亨作为南海诸邦之间的海中之国、下西洋的必经之地，它在马六甲开港前，俨然便是各国商旅货物在南海西洋航线交易往来的集散中心，一直都没有停止出现在中文文献的记载当中。一直到马六甲于 1511 年被葡萄牙人占领都城以后，彭亨作为延续着马六甲王朝法统的分支，还是继续对华往来。

费信是郑和的翻译官员，他曾经在永乐七年（1409 年）、十年（1412 年）、十三年（1415 年）以及宣德五年（1430 年）四次随郑和下西洋。费信在正统元年（1436 年）撰著的《星槎胜览》上下卷，正如郑和另外两位曾经的随员，马欢写的《瀛崖胜览》，还有巩珍写的《西洋番国志》，都是后人参考郑和航程各国的第一手史料。不过，彭亨在马欢和巩珍撰稿时可能已经归属满刺加，所以他们的文字都没有提及彭亨国；而费信的文字分前后集，前集是描述本身亲历的二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后集则包括采辑汪大渊《岛夷志略》等旧说传闻，记载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因此，彭亨国虽然后来归属满刺加王朝，费信书中依然记录了这个在他永乐年代出访西洋前后曾经遣使明朝的海上城邦。

《星槎胜览》记载“彭坑国”，是说此国“在暹罗之西，石崖周匝崎岖，远如平寨。田沃，米谷盛。气候常温。风俗尚怪，刻木为神，杀人血祭祷，求福禳灾。男女椎髻，穿长衫，系单布，富家女子金圈四五饰于顶发，常人五色珠圈。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地产黄熟香、沉香、片脑、花锡、降香。货用金银、色绢、爪哇布、铜铁器、鼓板之属。”^①而费信《星槎胜览》每叙述一个地方，后头都会有赋诗总结，其述及“彭坑”的诗句，表达印象说：“嗟彼彭坑国，温和总是春；伤生在求福，刻木惯为神。尊敬惟从长，差科不到民；焉知施礼乐，立教序彝伦。”^②这意味着作者阅读彭亨的印象，留下了一声叹息，赞赏此地风物虽好，但地方社会不论是政治、民风，伦理规范，仍然是差强人意。

费信《星槎胜览》撰写“彭坑国”的前边数句，基本上沿用元朝汪大渊《岛夷志略》原先描述的“彭坑”。只是汪大渊原先说过

^①【明】费信撰、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4 年，第 55 页。

^②同上注，第 55-56 页。

彭亨“谷稍登，气候半热”，^①根据费信的见闻，被改写成“米谷盛，气候常温”。而《星槎胜览》在接下去继续写“彭坑国”的行文，有很大部分也还是沿续《岛夷志略》的说法，只是为着相符彭亨当时政治演变，去除《岛夷志略》原本说过的此地“有酋长”，^②并将“阉婆布”^③重新音译为“爪哇布”。但费信所笔下的彭亨印象，和汪大渊《岛夷志略》最是不同的，在于信仰风俗的演变。汪大渊介绍完毕彭亨天气，接着便写说此地“风俗与丁家卢小异”，^④费信则可能听闻重视彭亨发现了杀人献祭的风俗，于是把汪大渊原先形容丁家卢“风俗尚怪”^⑤移送去形容彭亨。《星槎胜览》类似汪大渊在《岛夷志略》陈述丁家卢“刻木为神，杀人血和酒祭之，每水旱疫厉，祷之立应”，^⑥指出明代的彭亨也有“刻香木为神，杀人血祭祷，求福禳灾”。

费信听闻彭亨出现杀人献祭的信仰，原本即是彭亨旧俗，是缘起于那时彭亨领地扩大至元代本属“丁家卢”（登加楼）的境内，抑或原本即是彭亨旧俗，后人难以考据。不过此说以后辗转沿续，一再出现在《西洋朝贡典录》、《武备志》、《皇明象胥录》、《皇明世法录》、《东西洋考》等多种文献。

《星槎胜览》面世的近百年后，黄省曾撰写的《西洋朝贡典录》约成书于1520年间，此时满刺加王朝已经在1511年遭受葡萄牙入侵，都城沦陷后，退守在彭亨和柔佛继续抗战。而黄省曾对海洋各国其实没有亲身经历，只自称采集《星槎胜览》《瀛崖胜览》等书重新编辑。但黄省曾沿续《星槎胜览》不知何故，认定彭亨杀人祭祀的风俗源自国王提倡，也把富女金圈绑髻风俗视为只有王妃才能享有的奢侈，所以他有些内容会引申想像说：“其王好怪，雕香木以为神，以人为牲而祷；其土气温和。其王妃以金为圈”。^⑦虽然

^①【元】汪大渊撰，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6页。

^②同上注。

^③同上注。

^④同上注。

^⑤同上注，第102页。

^⑥同上注。

^⑦【明】黄省曾撰，谢方点校：《西洋朝贡典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8页。

黄省曾并不真的熟悉海域地理，但他是相当完整的描述着那时彭亨对外贸易，对“冰片”这类物产多加考究：“其利鱼盐。其土沃，其谷宜稻。有椰子酒，多花锡、降香、沉香。有树焉，其状如杉，其子如豆蔻，皮有甲错，其脂名曰片脑，一曰龙脑，食之已痔。”^①这其中所谓“龙脑，食之已痔”，是指俗称“冰片”的龙脑香，药性清热解毒；正如后来谢方点校《西洋朝贡典录》是引用李时珍《本草纲目》，注解龙脑香外用可治疗痔疮。^②黄省曾提到食用，显然设想冰片作为各种中药方的配伍成分，内服可以防止痔疮或其他热毒。他还把彭亨依靠明朝贸易得利，结论为《皇明祖训》的庇佑，说：“祖训有之：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真圣主之谩言也，乃复列不征诸夷国名示诸将来。而渺尔彭亨，亦得载著金匱，何其华荣也。”^③

如果根据茅元仪编写的《武备志》，《武备志》卷 237 的“海外诸国考”提及彭亨，却是说“其俗上下亲狎，无寇盗。男女椎髻，好佛诵经”；^④这显然和费信和黄省曾的说法互相出入了，反而较能一致于马来亚东海岸许多沿岸暹罗村的地方记忆。上两世纪，从柬暹一直到马来亚东面沿海，各处分布南传佛教村落。这其中有些村落，至今还存在。《武备志》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 年），作为古代军事百科全书，主要是收辑前人文字整理而成。而说到《武备志》影响深远，最为人所知内容还是其卷 240 收录了《郑和航海图》。依照《航海图》的内容，可知远洋舰队如何使用牵星术、罗盘，结合沿线地标制定的针路、航线和航程计算，由此确可明白舰队大船当年经过彭亨，是直接经过石礁和苧麻山两处岛屿东面，继续南下；这样也能解释何以费信多次随船都不曾停驻在彭亨。可是单看《航海图》绘画地理分布，苧麻岛位置正好挡在石礁东边，石礁则是隔海遥对着西边的“彭坑港”，可见对泛称“洋船”沿海帆船而言，这两个外岛确保了彭亨避风港的优势。^⑤何况《武备志》也

^① 同上注。

^② 同上注，第 49 页。

^③ 同上注。

^④ 【明】茅元仪：《武备志》卷 237，收录在《四库禁燬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燬书丛刊》子部第 26 册，第 626 页。

^⑤ 同上注，第 659 页。

引用前人说法，重点说此处也有几种经贸输出产品：海盐、椰酒、冰脑、诸种香料、花锡。^①

阅读《星槎概览》和《武备志》，两书作者以时间相隔二百年，各自描述了迥然不同的彭亨信仰文化概况，有着不同的印象解说，由此对照张燮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东西洋考》，以及较后成书的《皇明象胥录》和《皇明世法录》，可知这几本的编撰者都是参考过《武备志》的资料来源，可是又有参考抄录《星槎概览》，所以他们才会在内容中结合着两种说法。其中《东西洋考》虽说比《武备志》早了几年成书，但作者遍览群书，可能是采用与《武备志》同源的更早材料。

张燮撰写《东西洋考》的优势，在于他的生活经历。他本来就在福建龙溪出生成长，而且为了侍奉父亲，一生无意于仕进，长期生活在石码镇，本居住在明朝东南海上交通的前线；所以他说要居家潜心著述，也意味着可以随时直接访问各国海商、舟师、水手、船户。当年张燮接受海澄知县和漳州府司理萧基、督饷别驾王起宗委托，撰写《东西洋考》为漳州对外贸易通商指南，他在记录彭亨风俗的时候，可能有注意过《武备志》也在引用的材料，并且对照了漳州当地民众长期交流彭亨的记忆，因此他在行文中是使用了带有判断意味的“俗渐好怪”四字，回顾当地民风说：“古称上下亲狎，民无寇盗，好佛诵经，而久乃寝漓也。俗渐好怪，刻香木为人像，杀生人血以祭，云：用此祈禳。”^②同时，他的文字也可能注意地方装饰的演变，不是跟随费信延续的汪大渊记载，以为只是女子采用金圈绑头髻，而是改写细节：“富者头著金圈数枚，贫人则五色烧珠为圈束之。”^③

不过，《东西洋考》书写彭亨的社会实相，比前人清楚详细，主要还是指出那时在彭亨当地出现奴隶买卖，和出现杀人祭祀之俗，都是源于来自婆罗洲的部落海盗，在海上虏掠生人，带到彭亨贩卖。而张燮的文字，也充分让人能够感受彭亨当地权贵的立场，肯定牵涉着贩卖奴隶的利益，因此他们方才“每为毛思贼遁逃主，

^① 同上注，第 626 页。

^② 【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 77 页。

^③ 同上注。

买所掠人，导致远近苦之。”^①而张燮《东西洋考》的注解也很清楚：“毛思贼者，婆罗属夷也，劫掠海上生人至彭亨卖之，代作昆仑奴。不如指者，则杀以供祭。每人得直三金。”^②这些在海上被绑架的可怜人，有些会被华人客商买走，变成华人帆船或家中的“昆仑奴”来源。而所谓彭亨的杀人祭祀风气泛滥，也是源于部落海盗有此信俗，他们会把自己不满意的俘虏，当成献祭供品。

根据张燮试图整理的文字表述，或能厘清明朝史料辗转抄录的所谓“杀生人血以祭”，解决其内容相对于马来西亚本土历史认识的疑惑。要知道，费信跟随郑和下南洋，他那时所见的彭亨王国，还属城邦形态的国家，在接受着古印度教信俗。可是在费信回程以后的不多年，到15世纪中叶，彭亨尊号 Maharaja Dewa Sura 的“大王”，已经被俘虏至满刺加，又成了满刺加苏丹的岳父，后来是他的外孙1470年开始新的彭亨王国。^③彭亨王国尊奉满刺加王朝正朔，国君和大臣也如满刺加追随清真信仰，当然亦不可能用人血祭祀其他神明。黄省曾把杀人祭祀归咎于王室，并不正确。而张燮记载时，是这个王国传承至最后一任的年代。元代《岛夷志略》便已经记述过马来亚东海岸血祭之俗，张燮联系着海上少数民族部落去说是“夷”俗，这反而是早期民族志学者常会接触的内容。

《皇明象胥录》成书于崇祯二年（1629年），时间稍后于《武备志》，作者茅瑞徵是茅元仪的堂兄，曾在天启元年（1621）担任过兵部职方主事，后升郎中。茅元仪原来也曾是兵部官员的属僚，他们堂兄弟两人较有机会阅读更多朝廷内藏文献，是肯定的。《皇明象胥录》关于彭亨的记载，绝大部分雷同《东西洋考》，谈及彭亨的信俗，即说当地人是“诵梵经”，又说杀人祭祀的原因“盖渐于夷风矣”。^④至于《皇明世法录》，作者陈仁锡，本是天启二年（1622年）探花，抗命魏忠贤被贬，至崇祯朝重新被用，《皇明世法录》成书时，作者已经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书中也是沿用上述

^① 同上注，第78页。

^② 同上注。

^③ Sejarah Kesultanan Pahang, Portal Dirajia Pahang, http://www.dirajapahang.my/portal/diraja/?page_id=115

^④ 【明】茅瑞徵：《皇明象胥录》卷4，收录在《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0册，第616页。

《皇明象胥录》同样的表述，兼有“诵梵经”和“盖渐于夷风矣”两种表述。

茅瑞徵的《皇明象胥录》虽然不像张燮那般描述详细，甚至能列出奴隶买卖的定价，但《皇明象胥录》其实也有相应的记载：“有婆罗属夷曰毛思贼，每掠人口海上，买彭亨充昆仑奴云。”^①平心而论，在那时的客观环境，很难想象没有华人海商参与买卖奴隶。不管这些海商买卖奴隶，是为了同情被拐卖者、须要劳动力、或者要找人服侍生活，这类掳掠人口贩卖的勾当应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否则唐宋元明从官方文书到民间章回小说也不会常见“昆仑奴”一词。

当下，随着几个世纪过去，那些在南海海上被虏被卖的各族部落民，因此落户在华东南土地的，如果有后代，很多可能早就不叫“蕃婆”“蕃仔”，更不再是古代“昆仑奴”的替代，他们已经成为闽粤家庭供奉的历代祖妣之一。^②

四、14 至 17 世纪屡次毁于战火的海港王城

以上述历朝中文材料佐证，尤其是以明朝《东西洋考》为据，对比 Linehan 笔下引用的荷人材料，确可以肯定彭亨当地华人的社区，自古便已经存在，至今不会少过五百年历史。北根王城的老城区，在上世纪便有旧北根（“旧城区”）和新北根（“新城区”）之分，这也是当地居民生活的熟悉概念。张燮《东西洋考》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他在书中提到 16-17 世纪的彭亨，叙述说明人眼中的王城北根印象，是说道“其城以木围之，方广可数里”。^③ 同一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的 Matelief 上将，也曾在 1607 年到访北根，那时的旧城区已是马来望族聚居的权贵区域；而“新城区”的形成也不迟于 17 世纪初，本来名称是“Kampong Cina”，在马来文意思即“华人乡镇”，Linehan 则以英文翻译为“中国城

^① 同上注，第 616-617 页。

^② Winstedt.R.O,1932.A History of Johor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10(3),pp.66-68.

^③ 【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77 页。

镇”(China Town)。^①但是,这座原来的王城,特别是其中的“华人乡镇”,却其实不可能从现存的北根面貌去追溯原来的历史景观。因为,此地在1612年曾经遭遇柔佛入侵,烽火焚城致使原来的“Kampong Cina”在战火中烧毁。

再去回顾元明间流传的海路针簿《顺风相送》,《顺风相送》其中的“彭坑山形水势图”,后边有一首附录“歌”,依据歌词提到华人在当地的经济活动,或可证明彭亨港口华人聚落的历史是可以追溯至15世纪。“歌”主要是祝愿的诗文,以歌词唱出妻子拜神的愿望,祈求保佑丈夫平安下西洋,又描述出海人在彭亨等地的经商场面。“歌”的作词者显然是真正出过海,所以才会清楚“彭亨港口我不宿,开去见山是芒盘”,^②同时又知道彭亨港口的重要商机是沙滩有玳瑁海龟;歌词后边于是提到,出海人把玳瑁壳加工做名贵梳子:“郎去南番及西洋,娘仔后头烧好香;娘仔烧香下头拜,好风愿送到西洋。郎去南番及彭亨,贩卜玳瑁及龟筒;好个开梳乞娘插,怯个开梳卖别人。”^③

直到现在,海龟到彭亨海滩上岸的时间,主要还是阳历4月以后,一直到8月前是高峰期。这时候,主要在西南季候风时节的前半阶段,虽说阳历5月以后,彭亨的风季进入《云麓漫钞》所谓“候南风则回”的适当时间,可是那时不止是追求“玳瑁”经济价值的海商,必须留在当地,其他舟子商旅也有这个时候不方便回航的理由。因为在马来西亚东海岸的气候,在西南季候风时节,遇上中央山脉挡风挡雨,空气湿度低而风势不大,是方便交通往来的数个月,包括深入山林采集贵重香料和药物;可是在南海上的西南季候风,特别是阳历6月至9月,印支半岛到华东南各地会频繁遇上暴风和烈雨。相信很少华人帆船会放弃尽量采集装载更多货物,反而乐意太早回航,去迎向华南南海与台湾海峡沿途屡屡发生的台风和暴雨。另一方面,适合北方船舶下彭亨的东北风季,则是要等到阳历12月以后,至隔年2月之间,风势最足,才是方便顺风相送的时刻。所以说,《顺风相送》歌词说海商舟子下西洋要依靠“好风愿

^① Linehan, W., op.cit.,2.

^② 向达编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7页。

^③ 同上注。

送”，到达彭亨之后还想捕集“玳瑁”加工“龟筒”，期间船舶也要入港保养维修，更要保障回航途中少遇大风大雨，都是总结现实经验的写照。航海生活，包括海港聚落出现，华人长年累月参与多民族共同体互相依赖生存，都可谓天道使然，源于受着季候风制约的历史原因。

帆船一入彭亨港，就得等待回航，本是一件必然的事，以《顺风相送》的内容以及其流传年代，结合现代在彭亨境内还能发现中国各朝代陶瓷，要说早在元明以前彭亨港口一带便拥有华人聚落，便不能不是合理的事情。在“歌”的内容间，还有是唱说着“新做宝舟新又新，新打舵繚如龙根；新做锭齿如龙爪，抛在澳港值千金”，^①应该是指停港的船维修好了以后，载着有利可图的玳瑁等产品，按照《顺风相送》所谓回针南澳等港的航线，顺着西南风一路北上交易。上文的“锭”字，《顺风相送》是以“舟”为旁首，笔者少年时生活在住槟榔屿闽南人渡头区，常见闽南老船夫写“船锭”两字，都是如此写法。

西人最早提到彭亨当地有“中国航船”来往邻近的北大年等地的文字记录，源自葡人的记载。正如 Linehan 引用葡人 Fernand Mandez Pinto 的报告，Pinto 在 1540 年率领商队赴彭亨北根都城，是为了会见葡萄牙驻马六甲将军在北根的葡商代办，双方准备合作完成在当地的生意交易以后，即启程前往北大年；可是就在某一个晚上，当地文莱富商兼使臣，以彭亨统治者通奸其妻子，把对方刺杀，导致全市陷入混乱；葡萄牙人力抗三股趁机打砸抢的匪徒以后，屡有伤亡，只得放弃财物，上船逃到北大年；后来葡人获得北大年统治者应允，决定以牙还牙，便在吉兰丹河口岸公然抢劫彭亨富商的“三艘中国帆船”，并且伤害对方七十四人。^②

如果只是单纯只依靠英文阅读彭亨的历史材料，要不是 Linehan 提及“中国航船”，阅读者可能便没有概念南海各处港镇会有华人聚落，是很难想像彭亨在区域的“国际化”。因此更难想象，从王城事变到吉兰丹河口事件，现场都会有华人帆船，而且都牵涉在

^① 同上注。

^② Linehan, W., op.cit., pp.22-25.

内。但是，根据《顺风相送》的针路图，以及根据“歌”的内容，至今可能对照海域迄今的自然条件，由此也可以回溯那个年代的南海诸邦都是海域国家，各民族依赖海上生活讲究顺风顺水，是一种生活常态。不仅从中国南下的帆船须要顺风掌舵，确保顺利抵达目标港口停泊靠岸，长期等待风向期间也忙碌生计；他们常年留在当地居住聚落的亲友，还有那些负责看守当地商店货仓的人员，也都可能在地在备有小型的短途帆船、舢舨、舢舨，甚至划着木筏，在周遭地区港口间长期交易往来。

如此海域生态，也在欧洲人 16 世纪绘制的世界地图留下证据。史丹佛大学图书馆 David Rumsey 地图中心的收藏当中，意大利地图学家 Urbano Monte 在 1587 年留下的世界地图，其亚洲部分，从华东华南南下南海海域，一路至爪哇，再转从马六甲海峡北上，沿着缅甸海东岸和印度洋，航路上都是密密麻麻分布着许多邦国或地区名称。画师在地图上边，也都画了很多同一模样的船型标志，标示各处停船港口，方便阅读地图时按图索骥，知道哪里可以上岸补给，或者避风居留。特别是地图绘画马来亚东西两岸的局部，这些船型标志，如图所示，东西两岸都是由北到南，形成丝路沿线各邦海港与河港市镇互相舟楫相接的基础。而地图上也多是以这些邦国之名称，称呼其海港之所在。不论是从半岛的东岸或者西岸出发，到了另一端时，一样可以发现沿线许多大小邦国，海港沿线相通，栉比鳞次。



图 2：意大利地图学家 Urbano Monte 1587 年手绘地图局部^①

马来亚的半岛中央山脉，特征就在由北到南山峦连绵，把东西两岸隔开两边。可是在半岛偏北的部位，东海岸的北大年（Patani）和吉兰丹（Kelantan，地图上作 Kalantan），相对呼应着西岸的吉打（Kedah，地图中作 Quedan），双边在相隔山山相连之间，犹有平原与河流可以互相交通。而在半岛的中部，西岸的马六甲，又是可以从麻坡河道（Sungai Muar）划船东进；沿途去到现在森美兰境内的马口（Bahau，地图上作 Brahau），在当地港口聚落停歇整修，再走短程道路换走彭亨河道，去向平地流域的北根一带。地图上写作 Pulotima 的岛屿，从地理位置看，应是刁曼岛，而其上方东岸绘制出唯一一条接近着马口的内陆河道，其连接着海口的陆地名称，地

^① 转引自 Katherine Parker, *A Mind at Work: Urbano Monte's 60-Sheet Manuscript World Map*, Barry Lawrence Ruderman Antique Maps, Inc. CA: 2017, p. 23.

方名称却不是现在通用的北根，而叫 Pulo Campan。这可能是马来文“干榜岛”（岛村）的音译，如此陆地上称呼地名为 Pulo（岛屿），因为并非指称海岛，或因此可能就是当时北根彭河河口众多岛屿的原名。^①历史上，半岛的东西两岸其实有过好几组这类搬运道（Portage Route），被马来人称为 Laluan Penarikan，都是“反向途径”，沿着一边海岸河流的下游反方向走，就可以在前往上游的途中，依靠陆路转站，连接另一边的河流上游，抵达相反的海岸。

由海商和海员组成聚落居民，如果把“中国帆船”停泊在彭亨港口，任由船身数月漂浮海水之上，也就有可能会遭遇废损；尚且，大凡商贸集散货物，都是讲究货畅其流，也不能只是长期居留彭亨北根，仅仅依托此处市镇生活，依赖内陆所及做买卖。所以众人在当地居留数月，便有可能依赖当地亲友，根据日常水流和风向的特征，航行在熟悉的局部小海域之间，来往邻近各地，甚至也可能通过搬运道去向马六甲等地。这也就导致明朝在彭亨邻近各地方，即使外国人的文书，也会留下不少华人出海的记载，包括说“中国帆船”在当地遇上各种吉凶事故。一直到清代，谢清高《海录》记载这带海域，提及吉兰丹（Kelantan）当地渔民，也有说及此处海流特征：“每日上午各操小舟，乘南风出港，下午则乘北风返棹。南风谓之出港风，北风谓之入港风，日日如此。”^②

此后，另外有荷兰航海人 Pieter Floris 的追忆文字，提及了彭亨在 1612 年 9 月发生的事件，很明显能说明在柔佛攻打彭亨的那一年，柔军曾把当地华人聚落毁于大火。这足证以后被唤作“新北根”的“华人乡镇”，其前身是在更早前已经拥有完整聚落形态。根据记载，柔佛统治者曾经在这一年带领人员到访彭亨，为自家儿子向彭亨公主求婚，在宴会上看中彭亨王另一位文莱王室女婿戴着宝珠戒指，要求对方高价出让，却遭到拒绝；于是柔佛统治者就在愤怒中离开了彭亨，随后再回头挥兵武装入侵彭亨，杀人放火，并烧毁了“华人乡镇”，也从此导致彭亨长期陷入饥荒。^③

^① Ibid.

^② 【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译：《海录校》《海录校释》，北京：商务印务馆，2002年，第24页。

^③ Bujong Bin Adil.1984,Sejarah Pahang, Kaula Lumpur:Percetakan Dewan Bahasa dan

现在看 Linehan 的原文，他书写 1612 年的彭亨，是参考引用张燮在 1617 年成书的《东西洋考》。^① 其他一些稍后出现的英文或马来文献，很多也都是留下了转引《东西洋考》的痕迹。不同的是，以《东西洋考》对证西人文献，如 Linehan 引用荷兰航海人 Pieter Floris 的记载，后者有说明，柔佛统治者“进攻市郊各处地点，让大火在他眼前燃烧，又在 Campon Sina 干下相同事情，导致彭亨残破凋零”，^② 不论在荷文或英文，Campon Sina 对应着马来文 Kampong Cina 的音译，原意都是指“华人聚落”或者“华人乡镇”。可是，张燮的重点不是为了要描写海上华人志，而是要撰写一部海上交通诸国指南，他看来会更重视各地大事记，也没提及当时的北根华人生活或者关注他们如何安置当地眷属。他是从本身理解，认为文莱在掌控婆罗洲，也可能是认识着柔佛延续着马六甲王朝法统，于是便说柔佛的一方身份是“副王”，和彭亨国王因着后者王婿“婆罗王子”的宝珠戒指结怨，然后叙述：“彭亨人人惶恐，不战自散，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彭亨王妃者，浚泥王之妹也。率众来援。副王焚掠其城郭宫室以归。是时彭亨国中，鬼哭三日。”^③

张燮虽然直说当时柔佛统治者在北根“焚掠其城郭宫室”，可是他的行文视角却不同于荷人，不像后者会特别关注印象中的华人聚落，也不似后者倾向报道个人的现场见闻。因此，当张燮提到彭亨王室撤退“金山”，张燮并没有说明那时的“金山”是否有华人采矿。可是，张燮《东西洋考》还是记载了，彭亨对柔佛的战事结束，彭亨统治者回归国土以后，却是不得善终，反而连同他原本留在彭亨摄政的长子一同遇难，遭受其次子“毒杀父，诛兄自立，至今尚为王”。^④ 由此便可知，那时彭亨或邻近地区华人众多，“华人乡镇”遭受大火焚城以后，幸免者似乎在短期内都有必要努力，尽快恢复生计，而来往帆船未曾隔绝或中断，因此各种消息都能陆续传播漳州。而《东西洋考》的“彭亨”全文，后边继续有文字谈及

Pustaka,Hlm67.

^① Linehan, W., op.cit.,pp.32-33.

^② Ibid., p.31.

^③ 【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8页。

^④ 同上注。

此地华人商铺，也是可能反映张燮记录的当时，彭亨已经重建华人港区聚落。张燮的文字有说道：“舟抵海岸，国有常献；国王为筑铺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铺，去舟亦不甚远；船上夜司，更在铺中卧者，音响辄相闻。”^①

上述商铺的形式，也印证了古代南海各地港口城镇的社会形态。其时的社会经济面貌，很多时候须要人和人的信任，依靠着相对固定的人事联系，以方便交通往来的社区，相互流通物质资源，完成彼此的互动互撑。各族商人既然是乘船冒着风浪危险，他们去到任何地方落脚，都不可能是买卖牟利以后即刻离开，至少是要根据风信，住上半年或更长时间。他们除了要承担资本风险，贡献地方经济，随时也可能要因应战争或瘟疫等事故，与当地共患难。后来在 19 世纪，南洋各市镇的现代化商铺，包括彭亨北根的华人商铺，可以不再是一群木构市铺，可是那一排排有骑楼的两层砖瓦店铺，还是保持旧时概念的载体——商人和家属就住在做生意的商铺楼上，各地马来人唤作 *Kampong Cina* 或 *Pekan* 的华人社区，既是商业区也是住宅区。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市舶司》提到宋朝市舶司的功能是说：“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②以此对照南宋赵彦卫在开禧二年（1206）成书的《云麓漫钞》，《云麓漫钞》卷五记载“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在各国交易的重点，提到“朋丰”即说是“木香”。^③以宋朝《云麓漫钞》对比元朝《岛夷志略》，大致可以发现，虽然彭亨自古拥有金矿银矿，可是宋元诸书记载彭亨热带物产，主要重视中土所缺的各种香料。而宋元明朝野从不放弃对彭贸易，即意味各省县不论对制香、入药、食物调味或防腐保存各种物件，长期都有广泛需要。可是随着人们往来彭亨愈多，认识越来越丰富，历朝记录的彭亨物产也会愈加细致而多样。到明朝张燮，他在《东西洋考》记载彭亨物产，首列是“沙金”，

^① 同上注，第 79-80 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6 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版，第 3364 页。

^③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152-153 页。

接下去也依然重视香料；而且此书除了记载《岛夷志略》提到的速香，另外又加了片脑、胡椒两样，说明都是“本朝充贡”。

参照李时珍《本草纲目》，李时珍这部药书相比《东西洋考》早了数十年面世，其中是有说及，随着云南和海南各地种植胡椒成功，虽说昔日胡椒贵比黄金，但那时已逐渐转变为老百姓日常调味品；^①所以按照《明实录》洪武十一年进贡记录查阅，知道早有此例，而《东西洋考》又说出那时彭亨原产的胡椒、速香、片脑依旧是位列在贡品级别，由此便可知彭亨这几项产物的质地确属上乘，直至万历朝都还是保持着作为贡品的等级。

由《明实录》到《东西洋考》的文字都在显示，明朝的彭亨疆域肯定已然扩大许多，超越宋元时代，不再是城邦形态的国家。当《东西洋考》谈及彭亨的“形胜名迹”，书中提及一处叫“狼宾”的地方；而且也提及此地的“片脑”或一般人俗称的“冰片”，在明朝被视为贡品级别时，原文这样写：“片脑。是狼宾所出者，本朝充贡。”^②依照张燮的漳州口音，“狼宾”唸起来是可以对称马来语“Rompin”。这地方现在还在，被当代中文翻译雅译为“云冰”，由此可证明朝彭亨国土，向南必然包括云冰。当年贡品冰片的原产地，现在是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少数低地热带雨林保护公园之一。

而《东西洋考》提到的另一“形胜名迹”是“金山”，又提及“金山”当地产“沙金”，“沙金”主要是指矿脉被流水或崩石冲刷入河床沙砾之间的含金砂石。如果把《东西洋考》这段记录，结合着葡萄牙人 Godinho de Eredia 在 1613 年撰写的马来亚半岛各地游记，可以看出当时彭亨马来人采用的淘金技术还很朴素，可能是至今流传的传统手工作业，主要是依靠人站在水中，用木盘淘取矿砂，以摇晃的手艺，从河沙淘洗出金砂。这即是张燮在书上记载说的：“排沙拣金，金末在镕”。^③Godinho de Eredia 有说过，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的彭亨黄金产量，主要是运输往马六甲，去向国际市

^①【明】李时珍撰，漆浩主编，《白话本草纲目》编委会编译：《白话本草纲目》第二卷，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 年，第 1834 页。

^②【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78-79 页。

^③同上注，第 78 页。

场；彭亨的统治者曾经在 1586 年给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赠送一块长度 2 码半的含金矿石。^①这样便相当清楚，那时彭亨的沙金，主要不是沿着马来半岛东海岸北上供应东亚市场，相反是通过陆路西出马六甲，再从马六甲运出印度洋，前往往中东和西欧。

《东西洋考》本书刊行在 1617 年，作者张燮固然记述彭亨二王子弑杀父王，以后又“至今尚为王”，也记载着彭亨港口边上的船商店铺，可是正在张燮《东西洋考》刻印之际，彭亨自 1615 年起，一切又有改变。首先是亚齐国王于 1614 年入侵柔佛，俘虏其王，要求对方履行先前合约，不和西方人合作，之后方才释放对方回去柔佛；而柔佛国主方才被亚齐放归，接着又在 1615 年挥军彭亨，驱逐那位杀父篡位的，另派自家王子作为彭亨的新统治者，立被弑国王亲弟的女儿为彭亨王后；再后来，当亚齐发现柔佛依旧和葡萄牙人藕断丝连，于是又在这年再次攻打柔佛，俘虏国王，转而支持其异母弟为新王；接着再于 1617 年入侵和烧毁北根各地，驱逐来自柔佛王室的新统治者，之后又将其岳父带回亚齐结为儿女亲家；同时，亚齐也把一万多彭亨百姓迁涉到亚齐，企图以外来人口增加本国经济繁华，并且由此补充和加强亚齐兵力。^②这一切新进展，发生在《东西洋考》刊印过程同时间，成了《东西洋考》不及追补的遗憾。

此后百余年，彭亨屡次动乱，一直都牵涉着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来自其他南海诸邦的阿齐人（Aceh）、米南加保人（Menangkabau），还有稍后势力壮大的武义士人（Bugis）。各股不外来势力，在接下去的近两百年间，各自在彭亨支持当地不同的内部势力，并且为着彼此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常有争斗，也就构成彭亨一再的内忧外患，国内一再出现不同的统治者世系。

原本，张燮《东西洋考》在 1617 年刊行，谈及彭亨等国那数年间屡屡出事，是记叙在书中的“柔佛”部分，说：“其酋好斗，屡开疆隙。彭亨、丁机宜之间迄无宁日”。^③等到十数年后，茅瑞徵以明朝兵部的背景，于崇祯二年（1629 年）刊行《皇明象胥录》，

^① Godinho de Eredia, M. 1930. Eredia's description of Malacca, Meridional India, and Cathay (Translated from the Portuguese with Notes by J.V. Mills). Journal of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8(1),p. 234.

^② Bujong Bin Adil.,op.cit.,hlm.71-73.

^③ 【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80 页。

他记载“彭亨”事迹，是在结尾的段落添上几句，说明彭亨近邻柔佛是“喜兵，彭亨、丁机宜之间，几无宁日”。^①由此大致可知，明朝当时对南海诸邦的认识源于海上消息络绎不绝。

17世纪，荷兰航海者约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f, 1618-1672）以他撰写的《荷使出访中国记》，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主题的权威。特别是他在书中记录了本身从1655至1657年的经历，由广州到北京的所见所闻，至今是后人研究清初中国的重要参考。Nieuhoff在他的亚洲旅行期间，其实也记载过彭亨和柔佛1650年代的海上联盟，成为那时能流传至今的少数西文记录。按Nieuhoff的记载，彭亨出产沙金、锡米、胡椒、豆蔻、各种香木、钻石，以及牛黄。^②可是在Nieuhoff的印象中，那时的北根其实不是一般想象中的城市，更接近小镇模样，全镇被高达二十四英尺的大树桐木栅包围着，四角架设的碉堡也不是使用砖土建的，镇内房屋则如同被人四散丢进林子似的，错落在椰树和其他树木之间；而作者所见的市镇，只有统治者居住的宫室才是木构的；所有街巷也都在左右两旁围上竹篱笆识别道路边界，道路后边则是住宅，都是以亚答叶子编织的墙身和屋顶。^③

17至18世纪的两百年期间，北根王城不断更换主导者，彭亨邦国历史固是继续发展演变，各种文献却是罕有提及彭亨境内华人。无论如何，根据彭亨地理位置，可知那时彭亨的金子和香料要往西走，最便捷的方式是从陆路通往半岛西岸，借助他人国境港口，运往中东和欧洲。彭亨可以选择先后葡殖或荷殖的马六甲，或者通过更北面的霹雳王国，又得考虑海上亚齐势力的影响；这也是葡萄牙、荷兰、亚齐一再用兵彭亨的利益所在。直到1787年，也就在廖内王朝拥有柔佛与彭亨主权期间，荷兰人有了插手马来半岛东边的念头。那时候，身在柔佛的廖内王朝苏丹，带领了实质上统治彭亨的国务大臣（Bendahara），一行人到马六甲与荷方签约，规定荷兰

^①【明】茅瑞徵：《皇明象胥录》卷4，收录在《四库禁燬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燬书丛刊》史部第10册，第617页。

^② Begbie, P.J., 1834. The Malayan Peninsula: Embracing Its History,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Inhabitants. Madras: The Vepery Mission Press. pp.289-290.

^③ Ibid., p.291.

东印度公司入驻苏丹王宫所在的廖内群岛，负责管理海关，确保以后所有经过半岛南方的货运船，进入马来亚海域以前，先得在廖内向荷人缴税，否则不得航行向彭亨；可是，苏丹后来深觉懊悔，于是寻求加里曼丹海盗助阵，发动战争驱逐荷兰人。战争过后，苏丹唯恐荷兰人会卷土重来，便带着两百小船载着部队撤退至 Lingga 岛上，廖内岛上其他子民担心荷兰人势力不久回到廖内群岛，也纷纷提前搬迁向彭亨等地。^①

五、19 世纪北根华人乡镇和东北矿区的劫后复兴

现在彭亨可见华人历史文物，大部分都出现在自从敦阿里（Tun Ali）治理以后。1806 年，敦阿里（Tun Ali）以年龄二十五岁上任廖内王朝的国务大臣（Bendahara），在实质上继承了历任国务大臣拥有的彭亨封邑，此后一直到他在 1857 年逝世，他是以超过半世纪实质统治彭亨的国主身份，一边在武义士人担任资政的廖内王朝，一再回应斡旋各种内部纷扰，另一边则奋励精图治，力维持彭亨境内的长治久安。这时期的彭亨“华人乡镇”会留下较多安居乐业的具体记载，也是敦阿里时代大背景的一种体现。敦阿里逝世以后，随着彭亨在 19 世纪下半叶一再经历国运转折，长期遭遇内忧外患，屡屡发生内战，后来又被英国纳为保护国，原来彭亨许多更早期的华人历史材料，反而更不容易完整保全。

在马来世界的历史上，敦阿里的妻舅胡先（Husien），原本在 1812 年就有机会成为廖内苏丹。可是在胡先的父王亡故之际，在赶回王宫的航程半途中，居然遇上海上风浪，延误奔丧；这期间，朝中的武义士贵族资政，连同着贵族大臣，也就有机会变化态度，改而拥护胡先同父异母弟弟登基。这之后，敦阿里曾经试图发兵支援妻舅夺回政权，但是拥护新苏丹的另一派系找上英国东印度公司，说服正在托管荷殖马六甲的英国人，让后者出面劝阻敦阿里。等到廖内王朝后来又发生新变化，掌控柔佛统治权的军治大臣

^① Winstedt.R.O,1932.A History of Johor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10(3),pp.66-68.

(Temengong) 在 1819 年推举胡先 (Husien) 成为新王, 敦阿里发现胡先这次反过来获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支持, 源于胡先签订对英协议, 割让新加坡给英国, 敦阿里就不满意胡先了。以后多年, 敦阿里一贯自居胡先已故父王遗愿的践行者, 并且向掌治柔佛的廖内王朝军治大臣表态, 只愿坚持效忠廖内王朝, 但不想支持自家妻舅; 他还给重新回到马六甲的荷兰殖民者写信说英国人如此对待廖内王朝, 是“分离了所有兄弟亲人”。他也宣布拒绝见到任何英国旗帜出现在彭亨海域。直至若干年后, 敦阿里方才接受妻舅成为新苏丹的既成事实。^①

后来彭亨王国百年历史文献《彭亨纪年》(Hikayat Pahang), 描述近现代新兴彭亨王国的历史叙事, 是从敦阿里的的事迹说起, 记载了彭亨王国约由 1832 年开始, 至 1932 年之间的事迹。《彭亨纪年》说起老祖辈敦阿里, 是说在他统治的时代, 彭亨民生富庶, 境内随时有人可以掏出西班牙银元, 出手采购价值几万元的黄金, 而各种食物和用品全不匮乏, 尚且价廉物美, 白米价格长期维持在每二十五干当(每干当约等于 3.6 公斤)只卖一银元; 敦阿里为了促进境内商贸, 也是身体力行, 除了他自身食邑关丹(Kuantan)河道, 彭亨全境产品出入境免税, 因此便吸引许多外人往来贸易, 开启了彭亨久所未有的繁荣和安定。^②

广东梅州人谢清高, 1780 年至 1800 年曾经跟随葡人商船航海维生, 后来由杨炳南笔录其所见所闻, 撰成《海录》一书, 书中便有记载敦阿里上任之前的情形, 说那时早有华人深入吉兰丹(Kelantan)和彭亨, 在两国境内山区采矿谋生。根据谢清高的文字, 闽粤华人到吉兰丹和彭亨淘金, 是有组织的, 形成地方社会。那时候人们借助吉兰丹港口进出彭亨山区, 闽粤洋船都是到达吉兰丹港口就不再南行, 人都是从吉兰丹港口上下岸, 沿着河道走入矿区的, 遇上河中是巨石丛杂而水势峻厉, 就用小舟逆挽而上; 有者是一路南行至吉兰丹产金地呀喇顶(Galas), 有者则以呀喇顶连接着彭亨金矿产地“麻姑”山区的后山, 继续从山路走入彭亨国境这

^① Bujong Bin Adil., op.cit., hlm. 116-120.

^② Kalthum Jeran(ed.), 1986. Hikayat Pahang. Petaling Jaya: Penerbit Fajar Bakti. hlm. 6.

片西北区域。^①谢清高记忆中的“麻姑”，在地图上即 Raub，现译“劳勿”。

敦阿里统治期间，彭亨近代的商贸历史继续在国际化。1827年，一位英国商人从马六甲出发，带着鸦片到彭亨售卖，想要交易黄金。当时敦阿里担心英商单独进入彭亨山区的安危，安排了两位新加坡相当有名声的穆斯林商人，一路陪伴；这个英国商人回到马六甲病逝之前，遗留的日记记录了他从穆斯林商人听闻的商机，说他们在关丹附近的里帕尔河（Sungai Lepar）流域找到锡脉，只要等待旱季来临便能开采，届时会有许多华人矿户，也会有八百名马来人参与采矿。^②

Linehan《彭亨史》全文最后一页的附录内容，记载一段重要口述资料，进一步印证了谢清高所知道的：在吉兰丹和彭亨山区的矿户群体，是会随着发现新矿区，迁徙移动的，由此形成当地矿区聚落，即是上世纪许多华人矿镇的最初缘起。当时马来联邦博物馆的民族志学者 H. D. Noone，从吉兰丹老布赖（Pulai）金矿村村长得知，早在 1730 年代以前，在吉兰丹的呀喇顶，有过一处客家聚落，居民主要源自海陆丰（Hoi-Lu-Feng）的彭（Pang）姓宗族群体，长期开发山谷的矿区地带。后来随着地方发展，新到各群体逐渐人多势众，和原先群体相互挤压，彭姓乡社后人卒之迁徙至彭亨境内的瓜拉立卑（Kuala Lipis），开发距离河港五英里处的矿区，参与成就了此处老矿镇开埠历史。此地后来名称叫“Pang-Kong”，或马来文 Panggong，至今有个村子名叫 Kampong Simpang Panggong；而 Panggong 这马来名词，原意即是指称大型的木架构棚台，是为了露天采矿而搭建的。彭亨成为英属保护国之前，此处山区各矿场搭建的 Panggong，皆属彭亨日赖（Jelai）王侯领主 Maharaja Perba Jela 管辖，也是领主历年收取岁贡的主要来源。^③

按常理说，矿场都是要搭建棚架构造淘取矿砂平台，不方便妇孺参加在工作环境里头生活。至于矿区外围，矿场对外通路的路口

^①【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译：《海录校释》，北京：商务印务馆，2002年，第25页。

^② Linehan, W., op.cit., p.59.

^③ Ibid., p.259.

旁边那片角落（Simpang）区域，是既分隔又比邻着大众工作的矿场，才是矿户安置家人的理想环境，又方便监视和处理矿区对外交通。昔日历代日赖领主称大王侯（Maharaja），拥有实质的财政与军事力量，20世纪以前是掌握整个彭亨国西北部的地方实力，势力几可与彭亨统治者分庭抗礼，无疑由来自于矿业经济的发展。矿区的人口和经济资源，各种商铺贸易，是随着矿场和居住区互成正比的增加而持续扩张。

1971年，汉学家傅吾康与陈铁凡两人造访北根，在当地一所木屋小庙发现了刻着“乾隆癸未”（1763年）年份的“大唐本头公神”神位，以及“钦授嘒亨甲大学科黄公”的神主。隔年，他们又找到林子廉甲必丹（1811年—1868年）的神主，还有不知名的某甲必丹（？—1875年）和另一位陈甲必丹（1821年—1882年）的神主，以及“考特授呷必丹昌俊郑公之神位”（1827年—1894年）。^①依据这“大唐本头公”的称呼，足以说明那时候彭亨华人自我定位，是继续延续着唐代以来的海上传统，视自己为“唐人”，也自称“唐人”，称呼当地则视为“本头”（本处之缘起），更将当地视为属于“大唐”这个概念的“本头”。这个概念的由来，至少应该追溯至1730年代以前，那时海陆丰等地华人，已经在当地经历多年开矿开村的集体生活。无可否认，华人领袖根据本身方言以“嘒”为“彭”，又称“钦授嘒亨甲大学科黄公”，也就是承认着彭亨实质统治者是当地国主，还有本朝入居各国的民众，传统以来是相尊于各国国主而应守在地子民本份。

彭亨华人在18世纪的如此观念，自称“唐人”，以“本头”称谓自己所在的开拓区域，其实并非彭亨个别现象，应是当时整个海域的共有观念。由彭亨海路东进，对面是加里曼丹大岛，当地兰芳公司集体经营的地方社会，也是把领导称为“大唐总长”。从泰国至越南南部，更不少见各地华人常有自称“唐人”而据有“本头”公庙，他们几乎都是以公庙公共机构凝聚集体意识，称呼主祀神明“本头公”，维持规范秩序与处理大众福利的功能。包括马六甲海

^① 陈铁凡：《南洋华裔文物论集》，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第32-33页。

峡以北，英属槟榔屿“唐人”共同奉祀开埠大伯公，也是称呼原来庙祀所在的岛屿“本头公屿”，并称闽人组织大伯公会建祠所在巷子“本头公巷”。

“大唐本头公神”碑中榜以楷书书写，运笔流畅，而刻碑者亦做到逐字按照书法笔顺雕琢字划婉延的深浅层次变化，而其左榜是以“乾隆癸未年立”相对于右榜“双凤周翼振敬”。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曾在此碑相片下说明，那时除了在马六甲，在泰南宋卡也没有见过比之更老的石刻。^①究其实，更重要是石碑证明彭亨可以提供出南海华人如何各地构建彼此在地社会的其中一个案例：此时此际彭亨华人集体公庙，集体自我表述所透射出集体历史认知，是将“大唐”渊源、“本头”认同、“乾隆”年号、“双凤”祖籍，以应呼“神”的天命神道观念由“敬”而“立”有机的凝聚，由不忘根本彰显真挚感情的本头意识。

上述“周翼振”能于 1763 年在集体公庙题名立碑众人膜拜之神位，可能即是把大众信俗转变本处长久香火的本庙初建领导；至于碑上的“双凤”是否是清朝广东潮州揭阳县原来的双凤围村，抑或源自其他地方，则只能寄望于子孙或查阅大陆各地的族谱了。

参照宋朝朱彧撰写的《萍洲可谈》，“唐人”的指称可谓是由唐而宋，延续至今。《萍洲可谈》书中解释何以西北诸邦多称“汉人”，而南海诸邦多称“唐人”，是说前者渊源于汉朝朝令很早交通西北各国，后者则是唐朝更多通达南海诸邦的结果。^②清朝时，王士禛曾在礼部负责外务，他撰写的《池北偶谈》提及各国来使多称“唐人”，则解释“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③这样一项讨论，延续至到 17 世纪以后，或可能从整个海域多民族共存互通互动的大环境，包括从明遗民与大清子民的共存互动，发现新的意义。如广东雷州郑玖的河仙政权，历代效忠越南阮朝，最初是在真腊国的芒坎（Man Kam）垦荒，以后开辟由越南河仙金瓯一直到柬埔寨的磅逊港口大片地区，对外海岸线便连绵 200 公里，后人撰写

^① 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 2 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497 页。

^② 【宋】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42 页。

^③ 【清】王士禛著，文益人校点：《池北偶谈》，齐鲁书社，2007 年，第 415 页。

的《河仙镇叶镇郑氏家谱》便有形容说，此地是“……海外诸国，帆樯连络而来，其近华、唐、獠、蛮，流民丛集，户口稠密”。^①事实上，如果对照越南阮朝等时代的史籍文字，越南文献里头的“华”或“汉”往往是自称越南人；由此或得设想，“唐人”作为先民集体自称，或者被越南京族等其他汉语体系的族群称为“唐人”，是种认同概念；由此延续至19世纪，越南史籍那时依旧沿用着“唐人”一词，更显然是种概括的总称，如此既能包括也能搁置17世纪以来“明人”或“清人”之异同。^②

再以昔日老彭亨老北根老庙前边遗留的墓碑为据，其中咸丰元年（1851年）的“陈大目”夫妇墓碑，上方横刻“儒士”两字，就能很清楚反映墓中的“清·考大目陈公，妣溢莲番氏”生前的身份；此外，志明“同治四年（1865年）的“皇清显考十九世名燕盛陈公”墓碑，是由“孝男开才，孝女丁X”立碑；又有同治五年（1866年）袁连章夫妇碑未有之孙在当地立碑，却说明“世居西陇乡”。^③这样便能确定，当时这诸多家庭组成的社会，地方上是既有儒家的教学与传播，主流思想观念与文化渊源也还是不忘世系的礼法规制，有些家庭可能还是维系着原来的“世居”传承与宗族/家族义务，历代祖孙来往两地，而又是在此终老，乃至入土为安。而不论是陈大目的夫人“莲番氏”，或者同治八年（1869年）“嘉应显妣新女张母番墓”，^④这些妇女以“番”为姓而又拥有中文名字，应当便是文西阿都拉所说的民族通婚；她们生前为夫家传宗接代，要操劳华南家务也要操劳本土生计，逝世后是依照中华礼仪安葬，神主入祀惠潮嘉各乡祠堂，不论她们的后人如何开枝散叶，彼等共同在天之灵已经被尊为中华民族历代显妣。由此更可相信，在列圣宫庙内和庙前坟地清代遗迹，都是昔日长时间历史建构之遗痕，堪以表明华人先民在彭亨的历代传承，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社会，也不

^①【越南阮朝】武世营撰；陈荆和注释：《河仙镇叶镇郑氏家谱注释》，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哲学报》1955年第7期，第85页。

^②金雨雁：《十九世纪越南史籍中的“华、汉”含义的考证》，收录在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东南亚历史论文集》，1982年，第29-37页。

^③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2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01-502页。

^④同上注，第503页。

是生活在缺乏教育的情境。他们立的神位、墓碑，以及各种自我表述的方式和方向，投射出那年代的华人先民试图在南海诸邦实现安身立命的维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确立为何和如何在这里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

19 世纪，不论相对于敦阿里或者他境内统治的“唐民”，英国人在互为亲友的各族群眼中，才是最接近彭亨朝野的“远方外来者”。自荷兰和英国于 1824 年划海为界，英国把原来在苏门答腊西南部占领的明古连（Bencoolen）割让给荷兰人，交换了原来被荷兰人占据的马六甲，英属海峡殖民地也因此包括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即华人常俗称的“三州府”。三州府的设置，也意味着大英帝国从南到北控制了马来亚的半岛西岸的马六甲海峡以东。随着海峡殖民地三州府 1830 年归属于孟加拉省，再到 1832 年三州府首府由槟城迁往新加坡，即是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府地缘战略重新定位。新加坡作为马来亚南方的海岛，位处于南中国海、爪哇海和马六甲海峡的海路交界，当然更有利大英帝国经略马来亚，同时遥望同属英势力范围的加里曼丹大岛北部。这时，彭亨原产业资源，特别是金矿和锡矿，是英国等欧洲国家的需求，却都得途经马六甲，借助英方设在当地的海峡港口。英属马六甲的东山比邻着彭亨，西岸对正马六甲海峡中部，更是钳制着彭亨或柔佛不论从海路或陆路出入马六甲海峡。偏偏彭亨的局面，是不能不和英人打交道；因为彭亨即使借道 19 世纪上半叶在北方相对独立的霹雳王国，也会遇上英国在马六甲海峡北方长久经营的槟榔屿自由港，以及英方作为霹雳优势的锡矿与蔗糖采购者，会有牵制霹雳的对外关系。

另一方面，敦阿里曾在 1819 年反对割让新加坡，可是随着新加坡开港，彭亨产品对外运输很大程度上从中受益，这也许是敦阿里后来对待英商入境越趋友善的一大理由。

19 世纪 30 年代中叶，新加坡自由港开发已经明显利益彭亨的矿业运输。英殖驻马六甲军团中尉军官 Thomas John Newbold，后来是英国皇家学院院士，1839 年出版的《马六甲海峡英属拓殖地的政治与统计档案》，在上边报告说，彭亨的“阿里先生”（Inchi Ali）拥有的治理优势，基础在国境内拥有丰富的黄金和锡矿产量。根据

Newbold 的调查，彭亨全境四万人口，其中有一万二千人是华人，每年出口黄金超过三百金衡制磅，出口锡米超过一千担，堪称马来亚半岛最有秩序也最富有的邦国。不过，他也记载说，自从英国新开辟了新加坡港口，彭亨的金矿和锡矿都以海路为主，不再取道马六甲陆路运输。^①

然而，Newbold 也引用了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在 1828 年的出版文字，描述那年代北根王城的景物沧桑。这或许能反映，Newbold 称赞彭亨最有秩序而最富有，那时正值百废待兴。麦都思当时北上暹罗，除了经过北根王城，之后也到访登加楼王国下辖的甘马挽（Kemaman）。他描述那时北根王城说，王城距离彭亨河河口约有四五英里，河道虽然广阔，但河床太浅，平时水深只有一英寻（1.8 米），潮涨时水高二英寻，城镇范围就横跨在这条大河的两岸，而华人聚落则坐落在彭亨河左岸的边上，人口约有二百人；至于甘马挽，人口约有千人，年产锡米量保持在 1000 担左右，只是这产量比过去少了很多，不能再给登加楼（Trengganu）苏丹带来丰富矿税，所以当地只剩约百人华人在矿地生活，另外剩下约莫二十人生活在镇上。^②根据麦都思的形容，北根城中河道的深度，显然不适合大船直接进出，但宽度方便各种中小型船艇并排航行，与停泊海上的大帆船接驳货运。

而翻阅麦都思原文，他书中的彭亨印象，主要是在北根看见的和听讲的。麦都思说，彭亨中部地带那时的锡产量丰富而且纯正，每月可出口达约 75 吨，从内陆走进这处矿区要好几天路程，再走约二十天就能到达西面的金矿区，矿区后山的山脉，就是英属马六甲边境；而按照麦都思对矿区的估算，他认为彭亨境内的华人不止五千人，令人感叹这许多人都是染上鸦片烟瘾，生活成蹉跎岁月的模样。^③根据麦都思上边对河道天然条件的形容，这些矿区的各处矿场，显然都得在北根设立商号，陆续以水运把成果集中在货仓，等待出海。

^① Newbold, T.J., 1839.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 of Malacca, viz Penang, Malacca and Singapore; with the History of Malayan States on the Peninsula of Malacca, Vol. II. London: John Murray, pp. 56-57.

^② Ibid., pp. 57-60.

^③ Medhurst, W.H., 1838.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Boston: Crocker and Brewster, p. 279

麦都思还发现，彭亨要求每个华人每一次出境就要缴交约 12 英镑，他认为这是在压榨矿户。^①可是如果对照谢清高的《海录》所见，这种制度似乎是那时马来亚东岸诸邦的共同实践。在吉兰丹，则规定采金者出境须缴黄金一两，年老难以营生者减半，甲必丹也可以为贫穷者申请全免。^②而根据谢清高在《海录》的说法，那时华人常来常往，每年都是数百人从当地上岸进入吉兰丹，或者转入彭亨山区；吉兰丹对此处停泊的帆船也有规定，大凡航往各国前，都得按照船身大小和载货重量征收“凳头金”，大者五六百银元，小者二三百银元。^③由此可见，矿区不论集体或个人经济，一般收入不差。

再依据麦都思的传教士经验，彭亨当时其实不是处处安全，商旅行程都是冒险生涯。麦都思乘坐的那艘华人船只，前往登加楼半途遇上两艘海盗船夹攻，全程只能依靠水手在相互扔击炮药包的声浪中，保持冷静划桨加速，由掌船的头领和他的副手不断还击，直至趁着忽然吹起的风势，使得商船迅速脱离对方追踪。^④

Thomas John Newbold 之前，Peter James Begbie 更早在 1834 年出版过《马来亚半岛：拥抱其常民的历史与风俗习惯》一书，书中也一样是引用了麦都思在 1828 年的记载，但作者较多引用的是麦都思描写北根华人生活的部分，对照作者自己的北根印象。Peter James Begbie 有注意到，麦都思是根据自己由河口逆水行舟进村的经验，说华人村在河的左岸；但若以河水流向为准，华人村应该是在河的右岸；由此就能说明，彭亨河右岸那些以柱子架离地面的杂乱高脚屋，都是华人住家。^⑤ 华人村住家商铺显得老旧，周遭杂物凌乱，证明这里真是一个古老社区。不过，在作者眼中，这个住宅区的华人虽然自诩文明，却是不太晓得维持生活环境的清洁和舒适，所以他们的屋子底下堆积了各种粗杂饲料，混合着臭味难闻的污秽物件；而河的对岸包围在成排十英尺高的木栅里头，虽说是小镇真正

^① Ibid.,pp.279-280

^② 【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海录校释》，北京：商务印务馆，2002 年，第 25 页。

^③ 同上注。

^④ Medhurst.W.H.,op.cit.,p.280.

^⑤ Begbie,op.cit.pp.290.

的核心地带，也不复 17 世纪原貌，依旧是麦都思形容凌乱市容。^①但 Peter James Begbie 还是有观察到，那时有许多华人已经不住北根，而是聚居在彭亨境内大山丛林之间，见证着各处矿区聚落逐渐演变成乡镇。每年，会有不少采购沙金和锡米的商船，在彭亨河外的港口下舵停泊，等待集货；而负责运载的船艇也会在涨潮时穿过河栅的入口处，沿河到达华人村，把那些商行仓库储存的货物卸上船舱，然后就停在那边，再等待另一次涨潮时离岸，把货物送到停泊在港口外边的大船。^②

清代彭亨华人，也有从登加楼进出的。清朝同安人陈伦炯出任台湾总兵镇期间，于雍正八年（1730 年）编写完成《海国闻见录》，提到沿海南下的北大年、吉兰丹、登加楼和彭亨的内陆地理，有说：“大呷、吉连丹、丁嘴叻、彭亨诸国沿山相续……贸易难容多艘”，^③再对照麦都思的记载，或可以理解，杨炳南笔录谢清高的海上见闻，根据其梅县客家话的发音书写各国名称，是由北方的宋卡、北大年、吉兰丹、登加楼，一路向南，而把彭亨和登加楼称为“邦项”和“丁咖啰”；《海录》其中也有说明：“此由丁加罗陆路，约二日可到，疆域风俗人情，均与上数国同，亦产金，而麻姑所产为最”，^④又说“以上数国，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内港船往各国”。^⑤几个说法凑在一起便足以说明，那时华人到彭亨居住谋生，不见得只是在北根一处聚族而居，所以不一定都从北根出境。彭亨华人至迟在清朝雍乾年间，已经入山开发了许多矿区。人们出入彭亨的路线，也就增加许多选择。

彭亨产金都在山区，即如昔日粤人谐称“麻姑”的“劳勿”（Ruab）^⑥等地的矿区，又都是在彭亨国境北半部，因此，华人采金矿者如果是从海路入矿区，他们会选择到达登加楼即上岸，然后使

^① Ibid.,pp.290-291.

^② Ibid.,p.291.

^③ 【清】陈伦炯编撰，李长傅、陈代光校注：《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54 页。

^④ 【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译：《海录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35 页。

^⑤ 同上注。

^⑥ 同上注，第 37 页。

用河流和山路出入彭境，才是常理。这不仅节省航线开销，而且比起从北根入境以后再花十几天北上，省时省力少风险。可是，另一方面，彭亨境内产品和各地货物多有延续宋元明的航路，以北根为集散地点；帆船在当地入港修整以及等待回程季候风，也不会在那几个月闲着，还是可以借助港口小风候和潮流变化，往来邻近贸易。更何况人员纵可由吉兰丹和登加楼等地进入彭亨，彭亨境内的矿产，总不能绕过当地体制，翻山走入其他国邦境内，从他人海口运出。所以彭亨港口的真实情况，固然正如陈伦炯说的“贸易难容多艘”，却又是如谢清高所说的“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内港船往各国”。

1838年，马来作家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受着新加坡华人朋友委托，一行人乘船前往当时爆发内战的吉兰丹，准备呈交书信予统治当地的马来拉惹，半途中于3月27日子夜到达彭亨港口。当他们一行人由港口航向彭亨河上游，到了新北根（Pekan Bahru）的华人村，便发现岸边守候着数百名浑身武装的华人和马来人。阿都拉一行人会见了这些彭亨人的头目，在对话一轮以后获准登陆，同时也被告知敦阿里正由华人甲必丹陪同出行，要花十几天工夫，前往更上游的日赖（Jelai）金矿区。文西阿都拉后来还听闻说，日赖矿区住了很多居民，也有人经营商铺。但是他也发现，自己暂住的北根，却是缺乏店子，市场和道路也不完善，那些高脚亚答屋分布在东一角西一片，屋底下都是垃圾；人们在屋底下焚烟熏蚊子，又弄得自己的衣服沾满烟熏的痕迹。全镇就只有华人村拥有道路，路的长度约等于五十个人向左右两端拉长手臂（马来语称为50 depa，每depa约等于六英尺）。文西阿都拉在彭亨居住了四天，感觉此地的自然资源富庶，居民却普遍贫穷而顽劣。他说，这里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在工作，还有不少人却是衣服得体而不务正业，带着各种武器四处行走炫耀，甚至很多都染上鸦片瘾。然后，阿都拉还察觉到，此处华人的都是客家人，住在高脚亚答屋，很多人也和马来人或峇里（Bali）女人通婚，小孩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父系的母语多于使用马来语。当地还有一间小亚答屋，是华人神庙。华人村隔河对面还是河左岸，后边是阿拉伯村。彭亨的监狱位于旧北根老

镇区，也是由华人负责管理，由统治者付款给华人甲必丹包办安排囚犯的日常饮食。而此地通用货币是彭亨自己发行的锡锭（Tampang），十六锡锭可换一西班牙银元。大凡要处决死囚前，刽子手会在三天前敲着鼓游街告示，而镇上每户华人也会在事后各出一锡锭，交给前来收集的刽子手，集款埋葬死者。^①

彭亨发行的锡锭货币，样子像个方形帽子，上面刻着文字图案，所以后人称为“锡帽钱”。敦阿里的政府最初发行的都是大锡帽，要等到 1847 年方才另外发行小锡帽钱。在 1850 年代至 1860 年代初，二十五枚锡帽子约等价一银元，小锡帽每一百个可以汇换一银元。彭亨国发行锡钱的一整套程序可以证实，华人在当地不止采矿或贸易维生，或者如上文所说负责管理监狱，他们也贡献了先进的冶炼和铸造技。自敦阿里时代，彭亨国每年四次发行锡锭钱，每次都先得由统治者授权，规定发行数目以后，便交给给特定华人工匠包办，在关丹（Kuantan）、Sematan、Lepar 和旧王城（Pekan Lama）四个地点开造。到了苏丹阿默（Sultan Ahmad）的时代，虽说有规定造钱的铸模必须交给几位大臣保管，铸币也由各地贵族与领主监工，可是统治者还是授权相关华人工匠承包。^②



图 3：锡帽钱

^① Abdullah. Munshi.,1913.Kisah Pelayaran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hi,Singapore: M.P.H.hlm.10-21.

^② Bujong Bin Adil.,op.cit,hlm.134-135.

六、彭亨华人甲必丹的战乱历史与残破记忆

2020年11月14日，两位除草工人清理老北根（Pekan Lama）彭亨第九任州务大臣莫哈末朱索故居前的草地，意外挖出了九块清代墓碑，其中就有傅吾康和陈铁凡提过的“钦授嘮啞甲大学科黄公”等人的墓碑。这的确有助于进一步解释19世纪的彭亨华人历史。从这些碑文的年代，对照彭亨历史，那些至死生活在彭亨的先人，除了黄学科甲必丹，当中许多人都可能经历过许多灾难。1850年代下半叶，自敦阿里薨逝以后，彭亨在1857年至1863年发生过内战，在1871至1874年又介入过雪兰莪内战，后来又屡次经历叛乱恐慌。这些死者生前可能见证过不少的惨烈与混乱，见证了英国最终成为彭亨宗主国，也见证着地方华人社会自那以后的盛衰。究其实，他们不单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还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受难者。

根据文西阿都拉的记载，彭亨华人在老北根有间神庙。由此对照傅吾康和陈铁凡访问过的老北根列圣宫，傅陈在这间木板搭建的伯公庙里边，见着乾隆年代立碑的“大唐本头公”神位，也见证了几位甲必丹的神主牌位，列圣宫当然就是文西阿都拉曾经描述的那间神庙，也就是彭亨华人在华人甲必丹时代的信仰与社会机构，那应该是毋庸置疑了。但是，傅吾康和陈铁凡在那时所见证过的列圣宫，也肯定不是文西阿都拉时代的原貌，而是1956年重修扩建以后的模样。^①只是，那时的“列圣宫”依旧是继续保持在原址，坐落在大片彭亨华人集体坟地上边。而现在所见“列圣宫”，又是1996年遭遇拆迁压力以后的结果，到2001年搬迁至新地址，已经是迎新换旧的结局。

此前，早期彭亨华人有传说，说彭亨华人先民在此建立列圣宫，缘起于当地华人曾经协助过彭亨国主打天下，获许在这片土地上建设公庙，办理公共义冢，纪念先人，因此后来在列圣宫原址前边，还能找着许多依稀刻着嘉庆年号的墓碑。不过，等到英属时

^① 夏观明报道：《庙宇随时建，古迹不常有：让伯公庙留下来》，载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东海岸分刊），1996年3月29日。

代，彭亨行政中心移向关丹（Kuantan），北根自1900年代便不再是全境的社会经济中心；而当代北根市区中心基本由四条街道交叉，组成“井”字模样，也是二十世纪初期以后的事；随着吉隆坡矿家陆佑在此开发椰子种植区和修建街道，华人商铺逐渐集中在陆佑修建的邓贵街，也是唯一以华人命名的街道。^① 自新的市容，取代过去西方人文献提过的“华人乡镇”，剩余的老庙和坟地，就是继续见证历史的古迹。

只不过，自二战之后，北根随着岁月沧桑演变成为老镇，老北根19世纪华人遗迹原址，已不再代表、象征或凝聚全境华人社会活动，逐渐被城市扩展边缘化，演变成为偏僻地区。1950年代，列圣宫老庙，大小只有20x20英尺，经过1956年一次修整，还是有人常来常往；而相对于列圣宫，更悠久的公共义冢，位于离庙半英里路程的甘榜班座，则墓碑多已残缺。不幸的是，也在上世纪下半叶，随着许多新居民陆续移殖至原来坟场地带，列圣宫也遭遇了剧烈的变故。那时列圣宫和公共义冢墓地，缺乏人员管理，久之就造成二百多个老坟墓，逐步让路于居住环境。这其中，陆续在铲平以后，不知去向。待到列圣宫管理委员会成立，才把伯公庙和庙前剩下的二十余墓碑围上围篱，保护下来。^②

由此可见，虽说列圣宫历史，就是彭亨在华人甲必丹时代的历史，但是后人至今能保下的文物毕竟不多。自1996年列圣宫收悉迁地通知，新庙2001年起易地为良，庙前原来所剩墓碑也被迁移至当地“华侨公山”，于壬午年（2002年）九月初二接受北根华社立碑，集中保护和接受香火；不论列圣宫自那时列下的《列圣宫历史古物》清单，或者现在保全的墓碑，都能显示上世纪许多人的努力功德。^③但同时也无可否认，当地前辈上世纪成立列圣宫管理单位以前，大量史料遗失，亦可能永远影响后人的历史认知。

^①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1页。

^② 夏观明报道：《庙宇随时建，古迹不常有：让伯公庙留下来》，载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东海岸分刊），1996年3月29日。

^③ 朱淑仪：《清朝墓碑出土，老北根忆从前：这块地神庙古墓并立》，载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东海岸分刊），2020年11月19日。

虽说傅吾康与陈铁凡 1971 年和 1972 年，最早记录庙中神主而以后有所出版，不过他们的到访时间，毕竟已经是遗憾正在发生着。那些年头。许多墓碑的证据消失，剩下可记录的甲必丹神主也不见得完整。随着 2020 年一些碑文出土，再结合着过去零星的史料，虽然依然是材料稀少，但或许还是比前人多些方便，凭着多出这几件稀少不足的材料，会有更多重新考据空间，可以更清晰勾勒原本就不完整的 19 世纪下半叶彭亨华人的面貌。

这些神主之间，其中生卒年月可考的，林子廉出生在 1811 年，逝世在 1868 年，生卒年代都是最早。^①至于黄学科，此前傅吾康和陈铁凡曾经说过，黄学科甲必丹的神主是庙中最大片的神主牌，在列圣宫被保存得很好，又是放置在较诸其他神主重要的位置上，长期接受各地善信崇拜，但可惜就是无从说明此人生平年代。^②但是，2020 年发现甲必丹夫妇的墓碑，至少可以补充过去学者的疑问，证实黄学科甲必丹在庙内神主排行辈分最高，是由于他早在 1825 年以前逝世，在历任甲必丹之间，是唯一的敦阿里执政初期的华人甲必丹，^③并且应该是首位入祀公庙接受后人公共祭祀的甲必丹。更可能，他就是当代彭亨王国首任华人甲必丹，此前的列圣宫或“华人乡镇”领袖不都具有相同资格。

以此对照彭亨历任统治者的掌权时间，1857 年至 1863 年彭亨的内战期间，是先由敦阿里的长子 Mutahir 继承执政，此后是 Ahmad 王子讨伐兄长行事不公，以后开创当代的彭亨苏丹传承体系。在两兄弟的长期对峙的期间，双方又是各有治理的占领区和支持者。因此，要考虑兄弟两人在那段期间哪一位委任过某位甲必丹，还得知道甲必丹的具体任期年代，以及那时谁在控制北根。这不能只是依靠神主或墓碑的单薄资料，以甲必丹的死亡年份作为结论，不一定准确。上文提及，文西阿都拉记载过，有位华人甲必丹在 1938 年追随过敦阿里访问日赖（Jelai）金矿区，如果根据傅、陈两位发现诸位甲必丹神主的生死年份推算，这位甲必丹有可能是牌位显示生于

^① 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 2 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498 页。

^② 同上注。第 500 页。

^③ 《北根马来高脚屋，惊现清末墓碑》，马来西亚《中国报》，2020 年 11 月 16 日。

1811年的林子廉，其牌位写作“显考特授甲必丹林公子廉”，当时只得27岁；但却也可能是另一位比林子廉较后去世于1875年的不知名甲必丹，或是迄今未曾发现名字的其中一任甲必丹。^①说到底，如果在黄学科甲必丹以后，还有过其他1863年以前的甲必丹，林子廉他们就有可能是在内战结束以后，方才因应着政权更迭，轮流上任。

但如果说明甲必丹是终身职务，只有前任在去世以后才会有继任，则现在可知的排列应该是黄学科（逝世于1825年以前前）、林子廉（逝世于1868年）、因神主模糊的不知名甲必丹（逝世于1875年）、神主上只能辨认姓“陈”的甲必丹（生于1820年，逝于1882年），以及郑昌俊（逝世于1894年）。^②彭亨这几位甲必丹的各自上任时间和任期长短，至今依然文献不足，因此也就不应骤然结论。

若从信仰文化的角度去说，列圣宫显然依照着中华传统先贤祠或忠烈祠的概念，是历代甲必丹入主的场所，而不是家祭的场所，所以其最早的黄学科神主牌位，一直到后来的郑昌俊以前，所有甲必丹牌位都是个人，而非夫妇牌位。这一点，通过黄学科夫妇合葬墓碑，更可反证。所以由此而言，从整体彭亨华人历史叙述需要的完整的结构，这些甲必丹是如何成为甲必丹而最后入庙接受公共祭祀，相比起何以他们必须是进入列圣宫，后面的解释显得重要。吉兰但父老原来指出列圣宫源于协助国主“打天下”的“勤王”传说就很重要了。这还显示出彭亨华人自古在当地身为有功子民，参与多元族群开拓领土和社会的合情合理合法。虽然，这段在传说中甚至可能发生在敦阿里时代以前，被先民追溯至清朝乾嘉两朝年代的历史，现在却是缺乏文献；可是后人还是可以从神主牌位证实黄学科是敦阿里“钦授”甲必丹，以及后来林子廉的获得“特授”是种分别待遇，还有彭亨联合义军作战胜利那年，到1874年继任国主也曾御赐列圣宫牌匾追溯“德泽流芳”，端倪出“勤王”的传说应是发生在“大唐本头公神”立碑前后，即敦阿里时代的甲必丹体制确立以前。彭亨过去的华人父老，将列圣宫“本头公”立庙，作为甲必丹入祠接受公祀之处，又以勤王之说佐证神圣降临和建庙权威，

^① 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2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98页。

^② 同上注，第498-500页。

是内涵了集体意识，设想说明中华宋元明朝代发展至当时的彭亨王室和华人贡献的关系。

黄学科夫妇墓碑，上边刻着“道光五年，潮州府揭阳县梅岗都，清·考甲大学科黄公、妣孺人顺贵施氏之墓”。^①按照俗例，一般合葬碑若无志明先人生卒年月，虽说有志明立碑年月，却不一定能用来说明谁先去世，甚至可能是迁葬或者合葬后重新立碑年月。只是，这块黄学科夫妇合葬碑，墓碑刻着“道光五年”即西元 1825 年，墓碑的中榜又是以“清”冠首，足可反映地方社会领袖带领大众延续的本朝认同；而造墓的规格适应着夫妇合葬习俗，排名采取男左女右，也可证实那时代的当地华人还能毋改祖德，拥有具体的家庭/家族传承意识。若把墓碑和神主的表述方式结合，亦能发现当地社会的主流认知，并不觉得死者既属清朝而又奉彭国“钦授”会有矛盾。这样更能反映，黄学科甲必丹时代的南海诸古国，各地方华人社会还是很传统，是会把“朝”和“国”视为可从不同方向并存的两个概念，而安于接受彭亨国主“钦授”的光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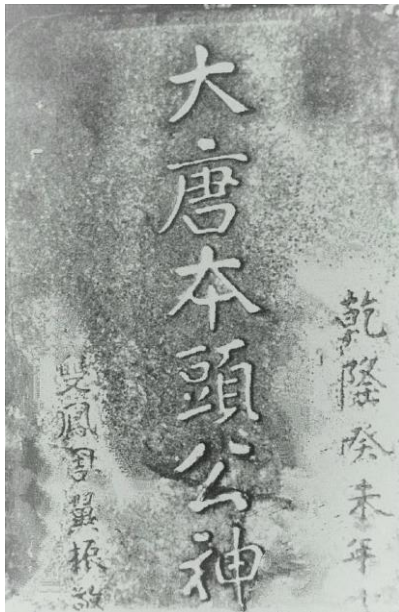


图 4：“大唐本头公神”石碑

^① 《北根马来高脚屋，惊现清末墓碑》，马来西亚《中国报》，2020 年 11 月 16 日。

现在列圣宫留下的文物，除了“大唐本头公神”石碑源于乾隆癸未年（1763年），其中的石炉和石板，分别是嘉庆乙亥年和丙子年，即1815与1816年，都是敦阿里时代以后的文物。此后最重要的文物，莫过于继任国主 Ahmad 先王陛下，在同治甲戌（1874年）清明时节命人代题送庙的牌匾，以“德泽”形容过去华人先民的贡献，而希冀指向未来世代的“流芳”；

同治岁次甲戌桐月题

德泽流芳 林邑代题

沐恩治子 本洲府王 敬酬

牌匾上的“同治甲戌桐月”，即是同治十三年或1874年的农历三月，也就是华人清明祭祖的月份。对比当年彭亨历史，彭亨诸路联合义军这时刚刚胜利结束雪兰莪内战。由是，同治十三年清明时节，彭亨的华人大众络绎不绝到公庙上香，祭祀彼此之“大唐本头公”各家各户也在庙前公共义冢墓园举行公祭、家祭、告慰自家先人，并且祭祀历代开拓斯土、佑护后人的先贤和英烈。他们都信仰着神圣与祖先即是本身文化所源和精神所本，又是以共同实践的信俗凝聚彼此的历史意识与本土感情。而此时此际，彭亨国主命人题字送匾，与众治子共同表彰“大唐本头公”之精神传承，定位曰“德泽流芳”，由此肯定华人开拓之功、助战之劳，意义匪浅。国主御赐此匾额，虽说是一位名叫林邑的人物代题，可这也证实国主身傍也有熟谙汉学艺文的人物，才能确定以赞颂彭亨华人列圣先贤“德泽流芳”勉励后世。

匾额文字可圈可点之处，是国主在匾额上的自我定位。此一“洲府王”称谓，不见得是沿续当地华人比照明清王朝体制的理解。自称“本洲”并不等于以“州”自称。最重要的是，此时彭亨国主 Ahmad 尚在坚持廖内苏丹王朝正朔，是以王者身份为廖内苏丹担任财务大臣，并维持着彭亨的自主，统辖治内各路领主。他是一直等待至1882年，以廖内复国无望，方才接受群臣劝进登基，延续马来苏丹王国传统，成就现代彭亨苏丹世系。以“洲府”而有“王”，可能是基于彭亨国主当时在廖内王朝体系拥有 Bendahara

Siwa Raja 尊号，根据马来世界对于跨海 wilayah（领土/治域）的概念，选择的翻译。如此简明扼要，也是适应了华人民间传统以来本有尊称“XX 府君”或“XX 府王”的习惯，方便华人的理解。

若按照当年傅吾康和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收录北根老庙前诸墓碑，他们所见的 1866 年至 1900 年之间的立碑，先人祖籍可考者，其中一位来自潮州潮安县茂龙屯，其他来自潮州澄海县金砂乡三、西陇乡一、鸥汀一、岐山一、风陇一，嘉应州者有二；还有其中一块无法确定的“世居柯陇乡”碑文，^① 主要都是来自清朝建制惠潮嘉道的潮州和嘉应两地。再根据 2020 年发现的墓碑，以及原来记载矿区文献，亦是更进一步证实，这段时间的彭亨居民，实际上包括惠潮嘉道的惠州海陆丰各地。而文西阿都拉在 1938 年登陆北根时，听到都是客家话，或者是他个人经验。可是他未必能肯定他在当地遇上的华人都是“客家人”。即使当时汕头尚未开港以前，那时北根的华人实情也不见得只有客家人，地方上的方言也不是客家语系独当一面。他可能仅仅是恰巧遇对方和自己同行诸人都熟谙客家话，发现用客家语交谈方便。

正如上边曾说，1990 年代以前列圣宫旧庙前边幸存的墓碑，有好几块墓碑是潮州府澄海县金砂乡先人的墓碑。在 2020 年发现的这些墓碑当中，除了黄学科夫妇墓碑以外，志明“同治十三年”（1874 年）的曾镇贤夫妇墓碑，上边也是刻着“考金砂寨镇贤曾公、妣东郊乡妙富谢氏 墓位，同治十三年甲戌二月 仙游”。清代潮安县的金砂寨和东郊乡，位置分别在今日的彩塘镇和意溪镇，是潮汕语流行区。曾镇贤的年代，同一条海路有不少潮州红头船载人到彭亨港口上岸，目的地却是从彭亨陆路走向南边的柔佛。1844 年南下的其中一艘洋船，船上载着不少金砂寨乡亲，其中就包括当时穷困潦倒的陈旭年，此人后来领导着马来亚南部潮州乡亲，支持柔佛新苏丹政权，完成现代柔佛变革的缘起。因此，在文西阿都拉的记载，可能源于他到达彭亨的时代，北根代表的彭亨对外工商业以客家矿业商人为主，潮语系华人参与集体社会，也通用客家话。

^① 同上注，第 502-507 页。

再以黄学科为例，黄故甲必丹的墓碑上，刻着原籍“揭阳县梅岗都”，即现代揭阳县揭东区，由此可知黄甲必丹的祖籍地本来是潮-客方言群混合区。因此不难想象，甲必丹身在彭亨当地，是须要使用梅岗都“半山客”方言，和日赖矿区那些惠州海陆丰“半山客”沟通。何况，他们彼此使用的方言，源头都是潮语盛行区域影响的客家方言。既然知道黄学科是“揭阳县梅岗都”人，所以甲必丹在当地伯公庙留下的神主，上边会写作“钦授嘒亨甲大学科黄公”，也就合理了。因为此地当年的地位，不是后来的小镇。当时是彭亨全境华人，以列圣宫的地位，替共同的已故甲必丹立牌位。所以这“嘒亨”二字，要是以客语发音来唸，是符合当地客家矿户的要求，也会较接近以客家方言唸诵汉字对接的马来语原来发音。这种案例，当然也是潮惠两府客家方言语腔在当地互通的例证。

若非黄学科甲必丹的墓碑在 2020 年出土，对照他原来在列圣宫的神主，确实是很难断定，早在文西阿都拉 1938 年到访彭亨以前，就有黄学科其人在 1825 年以前，是以潮州人身份，成为彭亨州的潮州籍贯的华人甲必丹。可能那时的彭亨正如文西阿都拉所说的，是通用客家话的地方。但更重要是，过去的和现在的这少数墓碑，至少能证实当地的华人社会，是一个跨县份认同的，主要包括潮客语系相处的华人社会。所以以后在黄学科去世后，他的神主牌位又是出现按照客家语音书写文字的痕迹，也是顺理成章。而文西阿都拉 19 世纪的彭亨“华人乡镇”记载，一直流传至今，内容详尽，也足以反映这个地方的华人社会，在那时是和其他族群密切互动的。

由此回溯清初潮惠地区老港口，其中最接近彭亨北根航路，较多可能避开官府干涉的港口，应是惠州陆丰县的碣石湾。这个港口在明清海禁时期也一样是私商不绝，先民常年两地往来当非难事。又或者，其中也有些先民是借助现在的神泉港和靖海港出海。这几个港口，本来就是粤东各县潮客语系方言群常用的出入口岸。大家在清代也还是按照上述《顺风相送》当年标示的沿海航道，一路以洋船相续，到达北根。再到天津条约，西方国家要求打开潮州的通商口岸，促成原来潮州城外的汕头地区于 1860 年开埠，北根海上对接的港口当然也会相应变化。但那以后，碣石湾还是有不少帆

船，来往南洋各埠。就客观而言，碣石湾的地理，主要最方便海陆丰潮客语系先民；19世纪下半叶以后，虽说汕头开港源于外国势力要求，可是一旦它成了沟通潮汕方言地区新兴经贸大港，就更有条件促成后来北根盛行潮州方言的现有面貌。

另外，2020年出土墓碑当中，志明“同治丙寅年”（1866年）的“日·考吉昭甲必丹癩林公墓”，遣词用字更值得考据。这位叫“林癩”的甲必丹，在当地生活的时间相互重叠在林子廉甲必丹的时代。假设其墓碑使用的“日”字源于潮语和客家话“日赖”（Jelai），“吉昭”亦是马来语“Kechil”的音译，意味“小”，则“林癩”的身份便是“日赖小甲必丹”。这种地方性质职称，归属于日赖土侯（Raja）领主的下辖，按理也得跟随土侯，面向北根王城称臣，遇上地方大事，也得知会北根王城委任的“甲大”，相互协调。“日·考吉昭甲必丹”的表达方式，也是认定墓主身份的规范用词，相比起“钦授嘍哼甲大”，“吉昭甲必丹”不属“钦授”，是不同层次的身份地位。由此或更能理解当时彭亨政治结构。当各地方华人开拓群体众多，又多有牵涉多民族构成共同体关系，而具体地区治理又是面向统治者和当地领主两种治理层次，北根王城的“甲大”以外，其他地区也会有当地的甲必丹，他们和王城的甲必丹分工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彭亨北根以外各地区另外有小甲必丹的制度，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这些甲必丹很多时候都需要仰仗地方领主相互支持，合作对外。1887年，在彭亨协议成为英属保护国的前夕，英方代表 Huge Clifford 奉命前往瓜拉立卑（Kuala Lipis）等地考察。他在2月抵达檳绒（Penjom）矿镇，会见了瓜拉立卑的马来领主，双方也有谈论起当地华人甲必丹遇上的压力。马来领主告诉英方，当地华人本来世代在那边开矿，缴贡给当地领主，立卑华人甲必丹近期还拉拢了几位“头家”到檳绒（Penjom）投资，集股三万元开采当地金矿和锡矿；可是到了1885年4月，当地出现了外来的欧人矿家，拿着苏丹颁发的土地批文，依靠苏丹跟前的贵族红人作为靠山，便想侵占华人开发的土地。^①苏丹的授权文字是说：“以华人正在工作的檳绒

^① Huge Clifford 的日记影印材料，可见于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Clifford, H.,

为据，从那边开始，向着右边和左边各五英里，前面和后面各五英里”，可是欧洲企业则表示这是他们获得授权接收华人矿地，便想谈判说要赔偿七百元，打发华人。而欧人另外也占据着日赖王侯表兄弟投资的一处金矿，更声明一分不赔。立卑领主眼见自己镇上数百华人与马来人都要失业，出面找欧人交涉，结果遭受欧人助理拔枪恐吓。^①

Huge Clifford 后来也探悉，苏丹当时谕令当地领主和头目，凡是领主代表本邦授权他人开发土地，半年内再未开发，欧洲人就可以取而代之。这时日赖王侯也是感受很激烈，自觉本身不受尊重，对这些外人又是鞭长莫及。不论领主或甲必丹，或者他们传统上的友好华商，还有数以百计华人和马来人矿户，都认为外人正在霸道的闯入和践踏他们的家园。^②而这时英殖作为欧洲强势，掌控着马六甲海峡主要港口，更有机会回应民众，出面斡旋，趁机介入彭亨国政。

2020 年同时发现有郑昌俊甲必丹一夫双妻合葬碑，碑文信息亦很丰富。根据傅陈先前对神主记录，郑昌俊逝世于 1894 年。当时彭亨已经成为英国属邦，华人人口也比过去稀少。郑昌俊的夫妇合葬碑，保留着华南传统，是夫婿葬在中间，平妻则是以入门先后，分葬左右两边。此碑最底刻着“墓”字，上边依序由左到右三行直排“妣诰命京姨人玉玃戴氏、考特授呷必丹昌俊郑公、妣特授京姨人香舌林氏”。这和原来列圣宫中藏着的夫妇三人神主，是一样的表述方式。三人神主格式作“妣诰命京姨人玉玃戴氏、显考特授呷必丹昌俊郑公之神主、妣特授京姨人香舌林氏”。^③ 同样这夫妇三人的神主牌，相对于他们的墓碑，除了排位增添冠首共用的“显”字，以及“之神主”代替了“墓”字，其余都是重复着相似文字和排列，可见这些职称所是家人亲友重视和熟悉的。如果按清朝规

1888.Journal of Mission to Pahang, in Hugh Clifford Diaries (CO 273/144) ,Kuala Lumpur : Arkib Negara Malaysia. 由于本文写作于马来西亚宣布紧急状态和疫情管制令年间，档案馆长期不开馆，翻查不易，以下 Clifford 相关事迹，皆转引自 Linchan 《彭亨史》为主。

^① Linehan, W.,op.cit., p.109.

^② Ibid.,p.110.

^③ 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 2 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499 页。

制，大凡妇女有“诰命”，往往由于母凭子贵或妻凭夫贵，包括有些是在死后由于夫贵或子贵而被追认，并没有实权；反而“特授”是具有实权意义的。这块墓碑上边所谓委任夫君“特授”甲必丹，平妻之间前者为“诰命”，而次者有“特授”实权，显然亦如黄学科获得的“钦命”，并非来自清朝廷体制，是源于彭亨国主有钦命地方管理人才的实务需要。当地华人当然早即认识自己处身多民族共同体，属于当地社会一份子，观念上也自视为彭亨国开拓子民，才会欣然接受“钦命”或“特授”；所以郑昌俊墓碑上称“京”可能是指王城，由此尊崇国朝甲必丹夫人，可视为生前死后的荣誉，刻在墓碑光宗耀祖，遗教子孙。如此看来，当时应是本有预计，以为后人将会本土世代相传，年年清明扫墓。

再说，郑昌俊的墓碑和神主，都是把“甲必丹”首字写成“呷必丹”字。不论在闽南、广府、潮州方言，以“呷”字音译“甲必丹”原文，都不可能对称马来文称呼“Kapitan”的第一和第二个音节；只有根据客家话的语音唸这个字，特别是按照海陆腔，才会音调异常接近。由此可以推论郑昌俊墓碑和神主都是以客家话书写。而参照现代汉语拼音，粤语“孺”的发音应作“yu”，粤东各地客家话则多唸作“Yi”；而按海陆腔，以民初“注音符号”注解海陆腔如何把“孺”唸“Yi”，其声母“ㄩ”是带有擦音的龈后音，韵母则是单韵母“i”，正如现在台海两岸客音教材也可以为据的，“孺”和“姨”在海陆腔是同样发音。以华南客家人常在墓碑和神主尊称已故妇人“孺人”，此处之前也有黄学科甲必丹夫人称“孺人”，可见此地相沿祖先旧俗。但彭亨本邦自 1857 年以后便遭遇超过二十年内战和对外作战，内部大量人口流失；因此，若承认彭亨华人屡经战乱，文化水平备受干扰，也可以考虑后来的墓碑会把夫人称呼为“姨人”，恰恰可能关乎识字能力高低。这反过来也算一项证据，反映隶属惠州府的海陆丰先民自 18 世纪以来便有许多人在当地终老，战乱期间也有许多人是一直留在当地生活。



图 5：郑昌俊甲必丹一夫双妻合葬碑

总的来说，以这些出土墓碑对照现在彭亨北根华人社会面貌，可见 19 世纪以前的彭亨华人基本源自潮语系和客语系。文西阿都拉发现当地华人都是“客家”，应当是他在北根遇见的华人，祖先多源自惠潮语盛行区；其中有些人虽然源自潮语系，但生活在半山客同胞之间，也会说些矿区同行的半山客语。这样并不矛盾于现在北根的地方社会印象，认为北根自二战以前即是潮语为主，甚至居民会把北根唤作“小潮州”。^①因为这个印象，不离 19 世纪中叶汕头开港以来的变化，即彭亨华人本以潮惠先民为主，历代长期接引亲戚南下的结果，也会影响当地社会流行的潮客语方言。彭亨的客家人，自 18 世纪末以来更密集迁徙往北部矿区；而北根却继续是统治者的行政中枢，也是联系华南各地的港口商贸地带，王城街上当然也会流行主要经济群体在矿区的方言。可是开商铺的群体和采矿的群体，不见得籍贯相同。一旦北根与汕头交通方便，更可能会改变市内华人人口构造。到了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提到独

^① 拿督陈延明口述，电话访谈于 2020 年 11 月 21 日。

立前北根华人居民多属潮州人，已经是说：“潮州人及其他籍贯的华人之进出口生意范围包括树桐、米粮、树胶等，华人也开设板厂及收购土产等。”^①

另外，自 1860 年，彭亨华人生活遭遇最大变化，其实不见得是源于汕头开港后，潮汕到当地落户经营各种生意的人口愈多，造成潮语在王城周遭逐渐势强。更重要是，彭亨全境在接下去将近三十年，历经动乱和政经变异，变成人口凋零，出走者众。

自敦阿里在 1857 年病逝，其长子 Mutahir 早在父亲年老时已有摄政姿态，在附属北根的甘崇（Ganchong）地区代父行政。而 Mutahir 继任亡父位子后，更觉实力在握，并没有按照父亲 1856 年 5 月立下的遗书，把关丹和兴楼（Endau）两处领地分封给弟弟 Ahmad。这导致双方追随者差点敦阿里的在葬礼场合剑拔弩张。这之后，Ahmad 于西历 7 月到新加坡邻近各处招兵买马，引起新加坡英殖民政府关注，也给了对方涉入彭亨内政的机会。英殖政府一再阻扰 Ahmad 企图联系和发动支持者，并知会彭亨统治者各种相关消息。^②可是，后来 Ahmad 离开新加坡，北上登加楼结集支持者，就不是英殖能阻止的。他还获得登加楼国主的承诺，发令其王国底下甘马挽的各路土侯助战。Ahmad 在该年 11 月率领甘马挽船队南下，很快就和彭亨境内义军会师，以历时五日五夜攻陷北根华人村；而甘马挽部队为了鼓舞士气和报复抵抗，允许将士在北根抢掠敌人七天七夜，连带彭亨各路起义王侯也得于分羹，以增加财富酬劳义军，之后部队方才整顿离开北根，再向甘崇（Ganchong）进军。^③

Ahmad 在 1857 年一度占领北根，也是暂时的，不久因战事不顺而撤退。英殖一再插手阻止 Ahmad 的外援，柔佛则派出武义士（Bugis）民系战士支持原政权，并且从霹雳王国雇佣米南加保（Minangkabau）战士对付叛军；这使得 Ahmad 屡次企图举事，屡次都不顺利，发生许多转折，一直到 1863 年 5 月方才重新入主北根。此前，华人看来都得继续服从原来的统治者，才能继续维系中

^①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 年，第 141 页。

^② Linehan, W., op. cit., pp. 66-68.

^③ Kalthum Jeran (ed.), op. cit., hlm. 13.

国大陆、柔佛和英属新加坡等地的贸易往来，也年年继续维持亲友出入本境，来往大陆。《彭亨纪年》有一段记载是说，当甘马挽、关丹和日赖等地联合部队在 1863 年攻陷北根的华人村，那时北根的华人都很害怕，态度就像他们平日遇到灾难祈求大伯公的时候，诚惶诚恐，主动把各种布料和食物奉献给入城的军事教长和义军将士，也有的人在现场请求饶命；而所有新政权的教长和将官则是一致同意，既已攻城成功，是应该既不杀人也不充公财产，宽赦所有华人。^①这段记载其实能反映北根华人在动乱时代的势单力薄，以及交战各方也意识到华人对经济稳定的作用。《彭亨纪年》的作者会以膜拜“大伯公”形容华人商民的诚惶诚恐，可见北根华人围绕着“列圣宫”作为信仰和社会中心，很早就是马来民众熟悉的生活印象。那些华人甲必丹，他们在掌权者底下继续商贸过活，其实都是缺乏实力和话语，无从有足够实力应对武装干戈；而新政权在攻入城中以后，其实也是理解这些华人区居民的状况，视为只是为了谋生的无辜百姓，应受宽待。

现在要论 19 世纪彭亨北根这些已知的各位华人甲必丹的任期，不论根据 1970 年代傅吾康、陈铁凡《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提及的生卒年代，或者是再加上 2020 年出土的墓碑文字，还是会有一定难度。除了黄学科是肯定去世于敦阿里时代，其他甲必丹都可能属于敦阿里、Mutahir 和 Ahmad 父子三人之间任何一位的执政年代。再到了英国人在 1887 年底把彭亨纳入英属，自郑昌俊甲必丹去世以后，一直到 20 世纪前夕，北根仍然长期实行甲必丹制度。

彭亨历史上，Ahmad 自 1863 年战胜兄长，他在接下去半个世纪的统治，展现出的政治优势，是善于积极调解许多过去恩怨。他首先宽赦敌对派系的先父臣子和亲友们，并迎娶敌对的堂兄弟的姐妹。再到 1870 年代，Mutahir 两个儿子一再谋叛后逃亡至雪兰莪，在当地遭遇地方土侯打击，Ahmad 不止是原谅了侄儿以及接应他们回归彭亨，他尚且承诺侄儿，挥兵参与雪兰莪内战，支持当年收留保护其侄儿的一方。邻国柔佛统治者原本是 Mutahir 的女婿，支持过岳父对付 Ahmad，双方还在刁曼岛等处领土纠纷，可是等到柔佛 1868

^① Ibid., hlm.48.

年将各岛领土划归彭亨，两人怀念亲戚往来，又是长期声气互通。1882年，Ahmad 听从了柔佛国主建议，以廖内王朝业已遭受荷兰殖民瓦解，彭亨无从继续奉廖内为正朔，于是接受各地领主拥立彭亨苏丹王朝。再后来，Sultan Ahmad 又是由柔佛协助和斡旋，谈判接受英政府成为保护国的条约。自 Sultan Ahmad 引入现代法治观念，一直到他 1914 年离开人世，马来各邦的发展和对话，确有助各邦后来组成马来亚联合邦，亦是当代马来西亚立国的基础。

彭亨华人 1860-1870 年代记录固然稀少，可是此时彭亨历史重要大事，都是围绕着消弭战乱的和解，以后又演变至挥兵义助雪兰莪战争；因此，列圣宫的“德泽流芳”牌匾，作为 Sultan Ahmad 在那年代肯定彭亨华人的象征物，历史意义相当重要。彭亨联军于 1873 年 11 月入住雪兰莪港口（Kuala Selangor），宣布战事基本进入尾声，列圣宫也在 1874 年清明节奉获国主嘉奖，在清明节期间，为了华人能贯彻彼等祀奉“大唐本头公”的精神，送上了“德泽流芳”匾额。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更不能说是时间上的巧合。

彭亨王国在 1872 至 1874 年参与雪兰莪内战，Ahmad 亲自带领各地领主和头目从雪兰莪东北方入境，占领过现在的甲洞（Kepong）等地区，当时一再动用各地华人协同作战，是否曾经动用全部彭亨日赖、立卑、劳勿等地开矿群体，抑或只是要求矿区和港口华人在后方支持生产和贸易，难以确定。而比较清楚的记录，是说彭亨部队包围吉隆坡期间，动用过雪兰莪叶亚来甲必丹的联军，攻打间征（Kanching）战役更是借助叶亚来属下 Ah Chin 的七十名华人竹筒火箭射手；而彭军行军路线，都是沿陆路和河道西进，或者借道柔佛再以海路北上，彭亨的文冬（Bentong）或者雪兰莪的甲洞（Kepong）、莪唛（Gombak）和巴生（Kelang），还有霹雳王国的士林河（Slim）等战区，都是牵涉着彭雪两邦华人大面积的矿区和经济作物区。^①至到上个世纪，居住在上述几个地区的华人，还是有不少人互相拥有亲友关系，同姓者也可能追溯祖上源自同村的族谱，迄今是彭雪两地许多老人家的童年回忆。

^① Bujong Bin Adil.,op.cit,hlm.pp.191-205.

根据记录尚可追溯，在 1870 年代上半叶，正当霹雳和雪兰莪发生内战，一直到两邦内战结束后的 1875 年，彭亨的立卑（Lipis）河畔，檳绒（Penjom）作为河畔的港口聚落，也是市集中心，以水路密切连接着日赖金矿与锡矿区，却是在和平中迎接自己的发展；河边整排店屋后头保持着的老残水井，是专供大众打水“冲凉”，当地领主也是住在这个华人为主的矿镇，方便处理日常公务。^①但是，随着彭亨人参与雪兰莪战争获得胜利，彭亨统治者回到本境政治，也得应付各地领主在战后的实力演变，处理内部势力的相互矛盾，所以更有必要权威凌驾各路领主，贯彻王权。1875 年前后，不论北根或是各地贵族领主，相互间屡有矛盾，不仅仅是权力暗斗，有时也会兵戎相见，北根也曾一再爆发讨伐立卑和日赖的武装冲突。^②这亦是上文提及 Huge Clifford 在 1887 年遇到的历史背景，领主为了自己底下的民众，也是邻居兼税户，向他诉苦了。每逢地方政治角力，当地华人甲必丹当然也会陷身困扰。

另一方面，彭亨除了各级华人甲必丹，其实还委托过新加坡华人作为王室代表，斡旋英殖事务。彭亨统治者 Ahmad 昔日失意时，曾经主动流亡新加坡，结交了不少老相识；自他在 1863 年掌握大权，他也不时致函新加坡英属海峡殖民地总督，解释彭亨立场，以防止英方介入干涉。所以，从文献可知，彭亨统治者决定介入雪兰莪内战，固然需要境内华人甲必丹维护境内经济收入和社会秩序，可是统治者境外也有亲自委任的华人代表，协助处理对外交涉，主要是对英交涉。1865 年，英国曾经派遣两艘战舰巡弋彭亨外沿列岛，说是有英籍华人到其中一座岛上伐木，惨遭抢劫杀害；而当时统治者 Ahmad 面对英方气势汹汹，明知这是彭柔领土争议地带，也不做激烈回应；他反而机智咬定凶手是非法潜入的柔佛子民，推卸掉彭亨责任，也欢迎英军周游列岛搜寻犯人，借机暗示彭亨拥有这列岛主权。^③再到 1874 年，英方再以一名柔佛村长在兴楼河遇害，怀疑彭亨统治阶层教唆杀人，把追究规格提升至英督登陆北根，以访彭名义兴师问罪；但后来彭英双方同意组成调查团，英方调查官

^① Clifford, H. 1897 (1903, reprinted). In Court and Kampong. London: Grant Richard, pp. 225.

^② Ibid., pp. 210-229.

^③ Winstedt, R. Oop. cit., p. 108.

员反而出乎总督的意料之外，力证彭亨政府无辜。^①新加坡总督留下的文字有说，此时彭亨在新加坡的首要代表，是一名华人。英督也说，他发现彭亨统治者通过写信给华人首要代表，一方面是要嘲笑英方总会捕风捉影，另一边却是趁机示好，演变成向新加坡招商引资，说明彭亨会听取英督建议，以优渥条件对外开放，保护外人入境生命财产，同时彭亨提出愿意出高薪，要从新加坡引进两百名华人采矿者。^②

可是，那时一些英殖官员轮番观察彭亨，发现这期间彭亨大幅度增加征税，才是构成境内华人大量流失的内在原因。当地矿工大凡西进霹雳和雪兰莪两邦，能有当地联系，都设法会留在新地方聚会同乡亲友，共同开发新矿区。而彭亨自 1880 年，本来正和邻近 Jelebu 发生领土争议，Ahmad 那时处理王位传承更倾向子传父业，也造成原本一直以继承人身份追随在他身边的弟弟，心怀不忿，双方支持势力一度交战；不过 Ahmad 这时确实也在引进欧资，还有新加坡华人资金，在国内圈地开矿。^③可是在新加坡邻近水域，太多其他欧洲人物出现在彭亨，而彭亨不受英国协调，对英国未必是好事。在这背景下，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 Frederick Weld 在 1885 年发函给英属霹雳王国代理参政司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要求瑞天咸访问彭亨，就不只是为了一探虚实，而且是希望能游说苏丹，确保彭亨政治有利英国的亚洲海域布局。

瑞天咸既然在霹雳王国服务英女皇政府，行程以考察彭亨内陆为目的，所以瑞天咸就不必从马六甲海峡南下新加坡再北上北根。他是由霹雳的巴都雅也（Batu Gajah）出发，翻山越境走入立卑的檳城，成为第一位从霹雳山路越境彭亨的英国人，再一路走向日赖等地，也一路上考察民情和物价，以后再顺着彭亨河顺流行船，直抵北根，包括在彭亨河口探访 Pulau Tawar 和淡马鲁（Temerloh）之间华人甘蔗糖工坊。^④

^① Parkinson, N., 1964.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Malaya: 1867-1877*.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4. pp. 187-188.

^② Ibid., p. 188.

^③ Thio, Eunice., 1957. *The Extension of British Control in Pahang*.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30(1), pp. 51-52.

^④ Swettenham, Frank. A., 1885. *Journal kept during a Journey across the Malay Peninsular*.

瑞天咸之前，英国地理学者 D. D. Daly 也曾在数年前带领一支勘察队伍，从森美兰王国入境，经历崎岖山路，一路走到北根；不过彭亨统治者 Ahmad 接待过这些人以后，并不乐意让他们知悉金矿区的确切地点。^①按瑞天咸记载，他在到达立卑时获悉，只要再步行约一小时，就能抵达附近的日赖老金矿区。^②而瑞天咸经过此行，显然更关注彭亨的经济局势。他意识到北根距离矿区较远，又得继续从港口经济抽税去支撑王城，结果是会造成各种物品价格失衡，剧烈影响民生。瑞天咸后来的北根观察报告，即以彭亨面临长期内耗，建议英方尽快介入彭亨，协助改革制度。瑞天咸指出，这里马来人大多很贫穷，华人矿户也只有约百余人，但偏偏在立卑等地，民众不论购买必需品或奢侈品，产品都是事先征收高税，首先落入北根的华人手上，再由这些华人随意定价出售。^③可是矿镇华人有矿镇华人的苦衷，他们告诉瑞天咸，任何人到当地开采黄金，都可能被他人以各种理由掠夺一空；而华人则是由于民众缺乏开矿经费，加上认定体制不够公道，没有多少人愿意留下来生活。^④

英方根据瑞天咸等人入彭摸底的报告，更积极提出要介入彭亨内政，要求确保当地的政策、法治、军事安全，其建议看来都是堂皇有理的。此时英国已经殖民槟城、新加坡和马六甲，霹雳和雪兰莪又是英属保护国，彭亨作为不论海上或陆上的邻居，原产品也多从英方港口转向西方；所以英方对于彭亨的设想，是不管彭亨发生任何变化，理所当然是可能损害双方共同利益。更何况，当时彭亨境内许多投资项目，都是源自新加坡，英方有责任保护殖民地居民的利益。瑞天咸还说了，地方缺乏治理，已经导致各族居民难以在本来富庶的土地上维生，他举出劳勿一位马来贵族苦苦支撑金矿为例，指出由于矿场缺乏资金，矿区就只有约二十名华人矿户继续工作，时作时停，有时是常年累月在停产。^⑤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15):1-38.

^① Daly, D. D., 1882. Survey and Explorations in the Native States of Malayan Peninsula, 1875-1882. Geographical Journal, London. (4):401.

^② Swettenham, Frank. A., op.cit., p.16.

^③ Ibid., pp.9-10.

^④ Ibid., pp.16.

^⑤ Ibid.

瑞天咸访问彭亨不两年，到了 1887 年，彭亨其实变化更大。上文说过，Huge Clifford 在 1887 年 2 月访问彭亨，曾经遇着立卑领主投诉，说有家欧人和马来贵族合作的新企业，利用宫中书写授权书有模糊之处，自行解释其中不够详尽的内容，强行侵占檳城华人甲必丹连同日赖王侯亲友在当地的矿区。那家新企业其实就是在 1885 年，也就是瑞天咸到访的那一年，4 月 27 日获得王宫的授权书。而 Huge Clifford 为着斡旋此事，约见欧人企业经理之前，当地的数百华人和马来村民，愤恨生计遭受剥夺，已经计划着攻打欧人办事处，只是立卑领主正在极力劝阻。但欧人预想着统治者山高皇帝远，企业也就不必在意村民意见，所以见着 Huge Clifford，只说愿意雇佣留在原矿区的华人矿户。最终，Huge Clifford 谈判还是有较好的结果，是华人和马来人矿区可以继续经营，只是他们原来要贡献给苏丹代理人百分之十的收成，以后要改交给这家企业。^①

1888 年，Huge Clifford 正式成为英国驻彭亨代办，在他的任期间，那些到彭亨圈地的欧人企业正在面临过去制造的后果，境内已经很难找到华人劳动力。Huge Clifford 这位英殖驻彭亨代办，职务类似紧邻国家驻彭领事，在扮演着“劝请”苏丹的角色，过程中亲自见证着当地矿工短缺，还有稻米歉收等灾难，目睹着穷困民众被迫把自家耕田的水牛贩卖去邻邦雪兰莪的巴生（Kelang）；而 Huge Clifford 这时更明显的发现，那时很少华人愿意继续留在彭亨，他只能想好如何说服苏丹实施各种政策，吸引更多华人到彭亨住下来安居乐业。^②

不能否认的是，整个 19 世纪，彭亨地方华人社会主要依赖农业经济。他们的收入起起落落，主要还得根据国际原产品市场需求。一旦彭亨境内华人觉得生活不下去，在彭亨讨生活越来越难，而邻近区域的社会经济面貌又是可供比较，彭亨华人社会就可能发生大量人口流失，集体力量也会变得势单力薄，内部社会风气更是涣散，文化水平低落。如此背景，甲必丹的素质和社会地位，亦可能大不如前。郑昌俊甲必丹逝世后三年，自英方参与整改彭亨内

^① Linehan, W., op. cit., p.110.

^② Linehan, W., op. cit., p.123.

政，北根的甲必丹剩下的权限似乎就只能处理本镇的事务。1897年9月27日，《檳城新报》报道：“华籍商人某，係彭亨属北研之甲必丹也，风闻日前该处参政司判定监禁三年；又闻甲必丹所以被禁之故，厥有三款：一因受贿，一因勒索，一因吓诈云。”^①这位甲必丹似乎也没有按照传统处理，不见入祀列圣宫接受公众祭祀。

七、19世纪末英方介入以后有待重构的历史叙述

古近代彭亨国华人的历史生态，不论衣食住行，端赖着海上帆船交通，又是要接受着季候风的制约。彭亨华人历史，也正如南洋许多地方的华人史，是不能简单而粗暴的预设认知，以为先辈主要是受着殖民政策干预，被他人“卖猪仔”下南洋。彭亨自唐宋元明，位处南海航路“海中”的位置，随着海上交通频密，就是帆船顺着季风停驻聚居的选地。当华人帆船根据季候风航行，彭亨历代国主，也不可能不重视邦国优势，经营彭亨河相连海洋的岸外水域，造就西洋中途贸易枢纽。人们到达北根，是既可以从陆路往西到达马六甲海峡东岸，也可以沿海北上南下，或跨海往现在的菲律宾南部、加里曼丹，还有爪哇等地。由此亦促进当地航海华商为主的聚落，大众年年长住在彭亨半年有加，期间来往邻近海域诸地交易产品。彭亨华人历朝早在北根和内陆聚族而居，在当地形成本身聚落社会，又和其他族群多元共生，也就并不足奇。所以历朝以来，一代接一代人上岸彭亨，其实都不是对当地空白无知，而是根据祖辈传承的航路与生活知识，融入历代先行者留下的聚落、社会与周遭联系；这里每家都可能有几个“蕃仔”，是少小送去潮州或揭阳私塾上学，长大又回到立卑或檳城看顾生意，到了北根公共场所就会参与大众祭祀“大唐本头公”，日常在家中则天天朝夕膜拜“唐蕃地主财神”。甚至来来去去的人，都可能要协助两边的亲友传口信，包括带口讯给终老于华东南地区的“蕃婆”祖母。

根据 Clifford 的记忆，华人一直到下世纪初期，还有人在使用马来世界常见的窄体长条船，雇佣苏门答腊人与吉兰丹人为他们划

^① 《檳城新报》，1897年9月27日。

船；可是那时欧人入主的矿区，已经使用蒸汽发动的浅水航行船，来往于檳城和港口之间；而在彭亨河下游，则依然流行短程出行不划舢舨，而是划竹筏。这些人工绑扎的竹筏，很方便载人载物，但是在彭河上游罕见有人使用，通常都是4英尺宽而长约20英尺，出行任务完成后，又可以拆开还原成一根根分散的竹杆，在市场售卖。^①

要等到上个世纪最初二十年间，海上蒸汽轮船越趋普遍，新加坡势成新的集散港口，北根方才完全失去元明犹能保持的盛况，再难成就南海中途贸易枢纽。可是那时市镇岸外的海上，虽然不再停泊太多帆船，河上还是有许多舢舨和舳舻，延续19世纪以前的情景，继续衔接着河口与海上的接驳运输。尤其在汽船和陆路交通还不很发达的年代，彭亨境内各地延续着传统的水上交通，依旧左右着地方民众生活的出行方式。正如拿督Mahmud bin Mat后来的回忆，在上世纪以前，彭亨有很多人家是居住在靠近河边或沼泽附近，其中有些住家是准备了自家的家庭用船，不过，当他全家在1907年用家里的船送他出门到外地唸书时，当时川行新加坡与彭亨的载人蒸汽轮船，不是川行北根，而是来往着关丹。^②当然，关丹的崛起，主要是英国将彭亨纳为受保护属邦以后，发展关丹成为行政中心。

不过，在这时候，宋代以来华人帆船来往彭亨港口的局面，尚有余韵。直至殖民时代后期，中式帆船相比西式轮船，前者的渡海成本依然相较便宜，所以一般先民从潮州下南洋，也有许多人继续选择古近代称为“洋船”的中程帆船。1996年，北根潮州会馆创办人兼当时列圣宫主席黄盛伟，七十六岁逝世前接受过访问，说他在年轻时也是乘坐大帆船下南洋，抵达北根。^③而越到后来，北根民众还是能继续见着有好些帆船停泊在沿岸海域，等待接驳船上货下货，但这些“大帆船”其实主要都是短程帆船，只做来往新加坡短途运输，主要是从新加坡运输货物到北根，然后会走近海和河道为

^① Cant, R.G. 1973.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ahang. Monograph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Singapore: Times Printers Sdn. Bhd. p.30.

^② Mahmud Mat., 1997. *Tinggal Kenangan: The Memoirs of Dato' Sir Mahmud bin Mat*.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hlm. 50-51.

^③ 夏观明报道：《庙宇随时建，古迹不常有：让伯公庙留下来》，载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东海岸分刊），1996年3月29日。

主，开往关丹、文德甲、淡马鲁及而连突等地；帆船来回各地卸货和收货，也会把北根商人在港口邻近的各渔村收购鱼获和海产，制作成咸鱼等产品，外销其他地区。^①

拿督 Mahmud bin Mat 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是少数接受英皇封赐爵士勋衔的马来官员。他在彭亨英属年代，自 1948 年至 1951 年担任过彭亨第一任总理大臣（Menteri Besar），即现在一般中文翻译的“州务大臣”。依据这位前辈撰写的回忆录，彭亨一直到上世纪初，内外交通主要还是依靠华人舢舨，这些舢舨需要的人手不多，船工的职业空间有限，他们来回于彭亨河上下游，在北根和立卑之间载人载货，都是以海峡殖民地银元计算工资，每月工资大约是 10-12 银元。^②这些华人舢舨在彭亨河航行，依然得要考虑季候风影响。一般北根和立卑之间的航程本来只要花六星期，一旦进入 10 月至 12 月的雨季，各处都会例常发生水患，河道水流急湍、航程就可能是耗时整整两个月。

无论如何，彭亨在英属前的历史材料确实不很完整。民众自过去以来有太多生活经验，社会日常活动包括了大众太熟悉的许多细节，多姿多彩，大部分人不会想过要留下白纸黑字。现在要重建彭亨古近代社会生活的知识，还得整合多方面的零星线索。所以，像上述拿督 Mahmud bin Mat 留下的口述历史，确可补充不足。另外，综合各方面史料，再作排比对照，亦有助更多考察许多细节和相互关系，回溯当时人事情景，从思考社会生活的逻辑重现历史面貌。由此而言，古代文献，不论汉文、梵文、巴利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荷兰文、英文、法文等文献，只要书写绘画在纸张、布、皮书或者碑铭雕刻上边，包括当代中国重视的域外汉文献，都能是史料；西方殖民者统治时期的官员商贾，或各族地方遗老口述纪录，也是史料。现在彭亨华人在日常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以及方言词汇，有不少历代传承的内容，亦是可印证过去历史的线索。

就像 Linehan 说过，Sultan Ahmad 年代，彭亨出现圆片形状锡钱，上边铸着中文公司名称，另外又有马来文和阿拉伯文说明文

^①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 年，第 140 页。

^② Ibid.,4-5.

字，可见当时彭亨内部，某些华人公司的信用，是有能力发行代币，以公司名义担保锡钱兑换货币的价值，确保可以使用在许多小宗买卖交易。可是，Linehan 描述说这种锡钱大体上是赌场发行小额筹码，以代替锡锭笨重而且面值大的不便，可以方便大众分散使用在小额赌注，他的说法就未必完整。^① 按照上几代老华人的生活常识，18世纪以至20世纪初期，这种锡币在暹罗、婆罗洲、马来亚半岛、印度尼西亚等地并不罕见。相反的，大凡矿区的规模较大而人数众多，“公司”或公共组织主导集体开矿，常有发行自己的锡钱。在彭亨矿区，常见各公司一致发行的一种锡钱，是如清朝铜钱一般大小，前边铸着“国宝流通”，后边铸上公司名称，中间也如明清铜钱开个方孔，方便大众以绳线串起绑带在身上，不论去到矿区、邻近各族聚落，以及港口商铺，都能日常消费，也方便相互找换。而个人拥有的锡钱，收集在一起，亦可以兑换等值的银元。这些锡币都是以有价值的金属铸造，又都是模仿清朝日常流通的铜钱模样，上边再以公司印记作承诺；所有锡币统一表达本身市场信用，就在铸造时其中一面是“国宝流通”四个字。如此，既说本币亦属彭亨邦国财政体系，地位是“国宝流通”，并且具有相对于银元的具体兑换率，锡钱当然不可能只是用作赌博筹码。而锡钱的文字，亦足可反映农矿开拓群体的集体意识，早就兼有“彭亨国”以及在地“公司”的落地概念。



图 6：圆片形状锡钱

^① Linehan, W., op.cit., p.239.

彭亨的锡钱，一直流行到上世纪初。二战以后，不论在彭亨或甚至邻邦柔佛，有些人家自先辈便来往矿区做生意的，家里可能还会存着几枚“国宝流通”锡钱。三十年前，马来西亚华人大会堂总会和马华文化协会等机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调查计划”，笔者有幸赴彭亨首府关丹，以副主任身份出席说明会，还遇见民众出示收藏的锡钱。因为有人藏在家里，因此迄今可见这类锡钱出现在国际古币市场。

现在国际古币市场所见的敦阿里年代的锡锭，其具体的帽子造型，中间是上小下宽的中空方块，四边平面边框其中一边开个小孔，方便使用者重叠着绑起来收藏。这种造型，也确保了合法锡锭只能是开模铸造，以统一形状、大小、重量、花纹，确保任何手工仿造都难以代替，亦无从匹比成本。现在古币市场里头，某些锡帽顶部平面印着“有利公司”字样，可能就是敦阿里年代其中一个承担铸造的单位。

另外，古币市场也常见小圆片的锡钱，其不同时期钱币文字，可能反映当时历史背景。例如，彭亨流行过一种“公合利记”，应属敦阿里执政初期的锡钱，背面即模仿清朝铜钱的铸了满文，表达这确实是对外使用的流通币。“国宝流通”当中，有背面作“两成孔方”的，也表明发行这种锡钱真是作“孔方”用。而总结现在拍卖市场所见，“国宝流通”背面公司名称不同，有铸着“铨成公司”、“和记”、“秉记”、“千顺”等名称，也有铸上祝福大众的“万事遂愿”等，可见早期华人有不同的开矿公司，大家都能意识彭亨邦国是彼此的生活经济共同体，铸币则各有所属。有意思的是，其中有种“成发房亨”，用潮州语音唸这“房亨”两字，就是即“彭亨”。这证明当地潮州商人在19世纪也是很有发展，所以有发行锡币的需要。

再举个例子说，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十六日前后，檳榔嶼《檳城新报》连续几天出现一位“彭亨司理人先胜洗”刊登的启事，声称“本公司欲招华工二千名，到彭亨的新班买怜矿地大小弗郎或机器开矿，任意选择地方，开锡苗每公斤公司抽栖十五斤。

凡欲承办者，可写信交公司理人先胜洗便妥。”^①根据这启事，可知彭亨 1904 年还是实行着 Huge Clifford 昔日在立卑谈判出来的制度。

矿区开矿，客观上就是深入山水森林去开荒，所以大众都要有武装，才能预防猛兽和外敌，保护共同谋生。此前矿区的经营，通常是由马来贵族、华人甲必丹或其他有影响力者出面，申请圈地以后，再招股组成“头家”集团负责投资设施；再有矿区里的矿户，则往往是头家们作为“东家”，呼朋唤友找来的“西家”个体户。

“西家”能以采矿多劳多得，“东家”投资者方才由“西家”个人所得抽取固定百分比作为投资回酬，同时替众人缴贡给王国和领主。由东西家一直到各矿户，是同乡、亲友、结义的关系，日常人人人不离武装，相互保护为生存需要，这种情境下共同生活，是较易凝聚集体认同，巩固社会关系和秩序；以后大众都能收入增加、组织家庭，开拓区也在扩大中，大众就会一再循环着呼朋唤友，人口愈来愈多，也就催动着矿区聚落演变至市镇的成形。所以，华人原来使用的“公司”制度，原来按字面说文解字，即是“公众”所拥有的“公共部门”。^②至今南洋闽粤方言日常生活使用着“公司”两字，也常会用作形容动词，比如两人以上的互动，常有说彼此是在“公司”着一事或一物，即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是“共同拥有”或“共同分享”。不过，1880 年代以后的彭亨，这种传统模式面临冲击。

探地采矿，本有一定风险。在矿区，一旦大范围的搭建好一切设备，也不可能肯定处处泥土下边都会有矿苗。华人原有那套传统的“公司”概念，便是矿户各别去承担得失风险，而抽成的一方则负担其基本吃住。像上述《槟城新报》出现的启事，说要找人承办两千人的矿区，让采矿者选择各自区域，最后是洋人企业强调要抽取产量的 15% 为利，这很明白不是一种薪金制度，当然更不可能是有人乐意根据此一制度去承担“卖猪仔”的成本风险，招募来两千人，接下去还得包办劳工数年吃住。这意味着，自 1885 年立卑华人甲必丹经营的“公司”面临洋人企业“公司”冲突，Clifford 介入斡

^① 《槟城新报》，1904 年 3 月 2 日。

^② 王琛发：《17—19 世纪南海华人社会与南洋的开拓华人 南洋开拓 史另类视角的解读》，载《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第 69 页。

旋以后，某种新的模式在当地逐渐演变成型。原本，华人或马来人矿场本来拥有共过享成果的分账传统，是东家有钱出钱，配合西家有力出力；可是，相比之下，后来欧人或新加坡英属华人/马来人公司的大规模圈地，却是公司得要事先缴纳一大笔钱财给政府，取得授权后，再找其他人开矿和承担风险。上述《槟城新报》可证明其方法大致是以招标方式，寻找华人成为分散承担各处至今的承包商，由此把风险转让华人采矿集团承担，同时继续从矿户劳动成果抽成。同时，上述《槟城新报》又可证明，到 1904 年，这类企业向华人矿户“抽栖”（抽税）的要求，已经涨至 15%。

特别是英国和彭亨在 1887 年底的双边协议，更是改变彭亨传统土地利益分配方式，保障着英属公司的机会，从插手彭亨朝野农矿业关系谋利。这其中第六项明文规定：彭亨不能随意要授权或者割让土地给任何人，包括非英籍华人或马来人；只要接受者不是英属公民或英属公司，都得预先知会英女皇阁下的政府，不能没有后者同意。^①这样一来，世代居住在彭亨的华人和马来人，包括当地甲必丹要像过去那样召集众头家到立卑投资，还有作为其上司的马来领主或地方头目，要自行委托属意的本地亲友开矿，都已经不可能。他们过去是资金能力是无从抗衡英方资本，后来却是在自家熟悉地区发现矿苗，也必须尊重对方的主导。英属资本的做法，正如上述《槟城新报》所言，新的局面是外资取下土地使用权，再把大片土地分割成十几片，成为各别选择的区域，每片各让十几家本地公司竞投，外资再考虑得标者。总之，当地华人或马来人想继续采矿谋生，不能再像过去直接合作马来领主、头目甚至苏丹；他们只要没有英属公民资格，就只能向这些圈地的英殖企业缴费。这些矿区企业大地主于是可以凌驾真正承担采矿的本地公司，依靠抽成获利，包括赚取本身先前缴费给彭亨政府的差额。

理论上，英属时代有更多外企进入彭亨圈地，确实是彭亨经济保障。由企业承诺政府，他们乐意承担投资风险，意味着不管采矿者有否成绩，企业也得首先拿出现款去保障彭亨政府预先收益。可是，商人讲究实际，事先要有把握，才会乐意付出少量资金去冒

^① Linchan, W., op.cit., p.120.

险，等待采矿者的劳动成果。换言之，他们是预算着承担得起的风险，试图翻手就转嫁风险给只能作为承包商的华人或马来民族资本，由此可能获得原来投资额数倍甚至数十倍盈利。何况，真正承担采矿成本的，依然是矿户集体。所以，1880年代中叶到1910年，即使境内战乱减少，华人采矿人口不见增长，殖民地合约的背景，以及制度操作的结果，都可能是内在因素之一。这很值得将来进一步探讨的。

另一方面，英国在1887年签下彭亨协议前后，不止一次关注彭亨治安，以英属公民或其他人在彭亨走失或受害，压迫彭亨接受英方建议改革政经体系。英国殖民政府除了在最早一次是借口英属阿拉伯人在彭亨遭人谋害，进行交涉；以后接下去数次，都是以英属华人受害为理由，一再以英属公民在彭亨受到压迫或杀害，逼迫彭亨接受英方派驻参政司，连同英方其他官员和军警也要进场长驻彭亨。

这其中，1886年，时任新加坡总督 Frederick Weld 在6月访问彭亨，游说苏丹接受英国派驻参政司徒劳无功，之后便曾报告伦敦殖民部门，说有位华人 Yeo Pan 的妻子自1884年被彭亨统治者扣留，孩子也受虐待身亡；而统治者流亡在新加坡的弟弟也曾就此事回应总督，说许多王公大臣都不满其兄，只要英国支持他能回朝当政，他就会接受英国委派参政司。当时瑞天咸正在伦敦休假，他在听闻此事以后，连忙提醒殖民部说，这名女子是在彭亨出生，丈夫是源自华南地区，在当地住了下来，所以夫妇两人都不是英属华人；再加上彭亨人经常不把这类事情看在眼里，民众不解英方举动，会视为小题大做，所以建议英政府再等待其他时机。英政府还是接纳了瑞天咸的意见，建议海峡殖民地总督，不妨继续采取温和路线，游说彭亨签订协议。^①

等到 Frederick Weld 翌年1月份派遣 Huge Clifford 前往彭亨，后者在4月带回来好消息，说彭亨愿意签订合作协议，总督也就打消考虑再用强硬手段。以后1887年底签订双边协议，Huge Clifford 出任了新职，成为第一位驻彭亨官员，但那时他的地位是以类似外交领事人员身份出任驻彭代办（Agent）。

^① Bujong Bin Adil.,op.cit,hlm.242-243.

英国驻彭亨新代办 Huge Clifford 驻守在北根不久，很快就发现英国有理由要进一步干涉彭亨内政。第一件事是华人盐商 Su Kim 生前欠下贵族大臣和苏丹二千五百元债务，死后万元家产受到充公，Clifford 代表家属斡旋，表示家属愿意偿还现款，苏丹却拿出死者遗书，说死者本就委托苏丹处理遗产，并告诉 Clifford 数目不够还债。^①第二件事，肇源于 1888 年 2 月，英属华商 Goh Hui 在王宫附近遇刺，凶手遗留下北根专有的马来剑款式，连带坊间后来出现谣言，说是苏丹看上对方妻子。当英国代办不接受彭亨国务大臣解释这可能是闹鬼，苏丹面对英方要求悬赏抓凶，贴布告却不愿盖章，双方接着就因 Goh Hui 夫妇把财产交给英国代办托管，连接着代办要安排彼等回去新加坡，也要求苏丹尽速实行英方草拟的新法律，发生冲突；最终苏丹极力强调自身的统治权力，而想要向英方毁约，又在 Goh Hui 去世后要求遗孀赔偿母亲欠款才能出境，发展至将死者遗孀拘禁在甲必丹家里。^②而 Clifford 印象深刻的，是甲必丹的态度。此前，当他去甲必丹家里通知 Goh Hui 死讯，发现甲必丹正忙着陪国务大臣和王弟赌博；之后，他也接到死者遗孀通知，苏丹打算把她转移到甲必丹家中，但那是个没有其他女性的地方。^③由于无从知晓郑昌俊甲必丹真正上任和卸任年代，也未能确定其前是谁，因此很难确定 Clifford 所说的北根甲必丹是哪一位甲必丹？这位甲必丹任职至何时？但总之，在此后，随着英国对彭亨政治重组，再到 1897 年发生北根甲必丹贪污案，原任甲必丹以不名誉的刑事罪入狱三年以后，彭亨华人甲必丹的身份权威已接近尾声了。

就英方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而言，自 1882 年至 1884 年，彭亨王朝统治者数度访问新加坡，邀请愈多当地的阿拉伯、欧洲和华裔资金，英方也就会愈加关注彭亨，担心未来是否可能影响英国的利益。Clifford 最初到彭亨，除了见到华人和阿拉伯人传统以来就在北根和邻近生活，做着各种生意，他从观察欧洲商人得出的结论是说：由于英国政府无从节制和协调彭亨政治，许多欧洲人正在趁此机会，沿着彭亨河岸圈地。而且，许多商人都是不必考虑本身资

^① Bujong Bin Adil.,op.cit,hlm.264-265.

^② Bujong Bin Adil.,op.cit,hlm.265-267.

^③ Linehan .W.,op.cit.,p.121.

金，只在彭亨北方圈了块地，就向伦敦、香港和澳洲等地招股集资。自从外人圈地，原来的马来领主和头目们，包括他们的华人朋友，原本在自身辖地合作开矿的土地权益被忽视了，那些马来人乡村矿区，特别是规模虽小而历史悠久的华人矿区，都被迫停止了。^①

彭亨发生的一切，固然可说明 Ahmad 苏丹的年代，不少英属或非英属华人，已经频繁来往北根与新加坡海路，英国更是视为息息相关殖民地利益。Clifford 游说苏丹的重点也是以维护彭亨安全为由。他指出，眼下彭亨既缺乏完善法律，又缺乏强大军事力量自卫，一旦彭亨境内外发生外人骚乱，或者彭亨的经济利益引起外敌眼红，都势必连带影响英帝国的海峡殖民地；可是，他也警告，英方和彭亨没有盟约，一旦彭亨发生状况，英国找不着理由支援彭亨。^②而 Goh Hui 的事件，却触动了新加坡新总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 Smith）的敏感。金文泰最初是致函彭亨，要求苏丹释放死者遗孀，让她平安回到新加坡；^③而他接下去还是继续借用此事，亲自访问北根，要彭亨交出凶手和赔偿，并要求彭亨接受英方派驻参政司，谈判破裂以后便立即报告伦敦，准备战舰北上，北根民众也陷入恐慌，纷纷准备逃亡行李。^④

后来的证据显示，金文泰总督为了彭亨的事件，写信给伦敦的殖民部总管，表明的自身立场，是要保障英国需要广阔的商业利益空间，所以要彭亨归属在内。他因此是毫不犹豫宣扬华人被杀害，以确保英国公民进入彭亨当地的生命和财富，由此亦意图促使彭亨接受他的建议，要把英属管理视为更优秀的统治方式。^⑤要是阅读前一位总督 Frederick Weld 先前在 1887 年写给英殖财政委员会的信件，可以发现总督称赞 Clifford 的功劳，重点在说明彭亨有利英国的优势，胜在比霹雳的土地更辽阔，尚且是农矿资源富庶；而且，他是结合着地缘政治的博弈理念去说，认为 Clifford 促成此次缔约成功，是有利英国接通马来亚半岛南部，把马来亚由西到东都纳入势力范

^① Cant, R.G., op.cit., p.27.

^② Thio, Eunice., op.cit., p.63.

^③ Ibid., p.70.

^④ Bujong Bin Adil., op.cit., hlm.269-274.

^⑤ Bujong Bin Adil., op.cit., hlm.272.

围，阻止暹罗想要成为插手成为马来诸邦的宗主国。^①当然，这之前，原本有传闻说法国人访问了彭亨苏丹，更是英国不乐意见到的事。^②只是，这一来，当英国一贯企图在彭亨利益最大化，一直声称彭亨土地的一些华人是“属于”大英帝国，华人被固化为“外来移民”的印象，从而作为英方干涉彭亨理由，无形中也会殃及池鱼，让“华人”一再成为争议概念。另一方面，自从英国和彭亨签下保护国协议，英方承认彭亨国的苏丹地位，再到1888年英方进一步成功压迫彭亨接受参政司入驻，更规定包括英属华人在内的英国子民在彭亨的优先权利，当地的非英属华人，亲友同聚一堂，有的是英属子民、有彭亨子民，也有的是初到贵境，更加面临身份定位的尴尬。

后来许多文字谈及今日马来西亚“彭亨州”历史，常有些是从表面因果关系说事，都说英国人由于英属华商被杀，全盘插手彭亨内政。其中一些非中文的简化叙述，甚至可能造成错觉，让读者看不到历代先民熟悉彭亨海陆，世代延续多民族同聚共存；而依靠着片面感觉英殖和华人先辈关系，便以为各地华人源于英殖引进，协助推进着殖民扩展进程。《彭亨纪年》对 Goh Hui 的事件，保留了“我方”立场的说辞，表明死者并非新加坡商人，而是直接从中国下南洋居住下来的彭亨子民，是跌倒地上撞中石头导致的死亡，但是被 Clifford 当成另一回事。^③可是，英国人的借题发挥，有备无患。在历史上，事件最终结局于柔佛苏丹自愿替双方斡旋，保护民众幸免于英军炮火；苏丹 Ahmad 最终也接受了英方的条件，接受英属军警入驻，以及接受英方参政司在10月以后入驻北根，后来英国第一任驻彭亨参政司 J. P. Rodger，在新加坡政府一番准备工作就绪以后，是在1889年7月方才到达彭亨上任。^④

正如上说，英方入主彭亨，是把英属华人视为英方利益共同体，让他们依靠帝国势力致富，也要求他们忠诚于帝国的布局。就 Huge Clifford 的立场，他也很重视引进非英属华人。Clifford 在1903年出任彭亨参政司期间，曾在美国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英

^① Lovat, Lady Alice.,1914.The Life of Sir Frederick Weld, A Pioneer of Empire.London : John Murray.p.393.

^② Thio,Eunice.,op.cit.,p60.

^③ Kalthum Jeran(ed.),op.cit.,hlm.107.

^④ Thio,Eunice.,op.cit.,pp.71-73.

属马来亚的迅速繁荣归功于华人牺牲贡献。他比较英国和荷兰华工政策的差别，是说英国人要张臂欢迎更多华人住下来，让他们在当地谋取自由和财富，充分把所得运用在当地发展。^①不过，当英国官员劝告彭亨等英属联邦更多引进“华工”，那许多英方官员的实际认知，毕竟不会把入境华人和英国公民一般平等待遇，而是按照着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去定位那些入境者。这意即说，他们要引进劳动力时，并不愿把他们视为尚未“归化”的华人，视同彭亨英国子民的地位；英殖也不像早期彭亨王朝宽厚，大凡共同生活者就一视同仁。于是英殖的实践，是把一切非英籍彭亨华人留在境外的子弟和亲友，凡是入境都先行视为“外来”，未来只能根据英方归化政策的演变，申请英属马来亚各邦英属公民权益或本土子民地位。

此时恰遇清末民族主义兴起，不论是清廷或革命党，都希望能借助南洋华人增加力量，华侨认同成为各方势力的政治资源，也是筹款来源，敌对各方不约而同都会游说当地华人，期望华民把更多关注转向中国内政。而英方政策，也是要确立华人的身份，以他们是否能归化英国，分别对待。这既是为了防范中国影响，也要说明英属子民在地的权力；还有他们祖辈以来在英属以前的地方贡献，也要归属于英国现在保护的范围内了。这便足以阻隔华人感受自身能在当地生活的理由。原本大家是简单地以为，自己能在此地安居，天天晨昏都给祖先烧香，就意味着家户户的祖先也到了此地，保佑子孙能在此开枝散叶、传宗接代；或甚至，当人人在此地组织家庭，包括有不少是异族通婚，人们也都可能意识到，本身能在当地和原乡跨境往来，经济则主要依赖当地的所有，也是得力于天命祖德的恩情眷顾，使得自己能拥有身在彭亨安居乐业的福地主权；所以，先民在祖辈文化遗传的潜移默化下，也会凭着祖先文化和生命传承，以自身生命交融脚下土地命脉，潜移默化自己是彭亨一份子的感觉，把自己生命经历和周围环境不感陌生的结合为家族记忆，相互认同。这是源自《大学》的所谓“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不论去到哪里，重要在“我”如何“在”，所以都

^① Clifford,H.,1903(Sept.).Rival Systems and the Malayan Peoples.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177)562:406.

能天人合一所以也能随遇而安而建构社会，也即传统“开枝散叶”模式的“落地生根”。但在此时，清代国族主义抬头，却是和西方殖民者将原来民众分而治之的政策，能够构成异曲同工的相互牵引。清代政治，各方争取南洋华人资源，主流的说法常是把中国的积弱归咎于列强侵略，结果反而是借用西方的国族概念，把华人从生活上本来自然而然认同自己正在开垦土地的感情，引导与转化，让他们结合面对西方殖民者压迫的体验，偏向遥远而不曾接触的帝王。英殖与清廷说法在相互推动，也由此相互拉扯，结果就造成清末出现的各种政治宣传，以及殖民者各种政策纷纭，首先影响原来许多家族历代本来以跨境一体的整个家庭维系的生活方式，实质也动摇了大众传统的开枝散叶认知。北根华人公山上，有块石碑的刻文写作“嘍哼华侨公山碑”，应是那之后的产物。这和当地华人在乾隆时期，在既有的“朝”的观念以外，集体出现了“大唐本头公”的“本头”观念知识，甚至也会将生活寄托对“国宝流通”的繁荣憧憬，当属两种出现落差以后的自我认知体系。

在英属马来亚的历史上，Huge Clifford 长期和彭亨苏丹磨合的过程，使得他卒之成为对方最能信任和了解的英国官员。他在 1891 年出任过代理参政司，1896 年至 1900 年出任参政司，在 1901 年至 1903 年又再度出任驻彭亨参政司。最终，他个人的公务生涯构成彭亨历史的一部分，迄今彭亨各地有好几所学校和公共空间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Huge Clifford 出任参政司的年代大力提倡“引进华人”，彭亨上世纪初剧烈减少的华人人口，确有过逐渐回升趋势。可是更大趋势是许多人去了雪兰莪、霹雳和柔佛，他们在这几个邻邦寻找新的开发区。因此，本邦华人人口总数，就不可能再现 1820 年代的局面，会是华人占总人口三分之一。1888 年，彭亨马来人口 48,000 人、华人 1,500 人、欧洲人 15 人，原住民 10,000 人；^①再到 1891 年，彭亨马来人人口 51,146、欧洲人 102 人、原住民 2,032 人，而华人的总数比三年前倍增，达到 3241 人，主要也还是分布在昔日北根

^① Pahang Annual Report, 1888. 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p.1195.

以及如檳城、林明、关丹及劳勿等矿区周遭。^①这其中，过去以来的政治动荡，劫掠烧杀，是造成各族居民流离失所的理由。甚至在1892年，彭亨发生 Mat Kilau 带领反殖斗争，在马来西亚国家历史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可是起义部队在对抗倾向英军的马来人联合部队时，在转进 Kuala Tembeling 的路途上，也发生过对待平民的暴力，有人转去华人聚落抢掠。^②根据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北根在经历屡次的折腾之后，城镇范围虽说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有扩大也有发展，到了 1911 年。华裔人口仅占 3% 左右。^③

八、后语

随着彭亨在 1889 年接受了英国参政司制度，首位英国参政司 J. P. Rodger 带着 15 位欧人官僚，由英方军警力量支持，开始彭亨的体制改革，彭亨的现代史也就是英国伦敦殖民部插手当地的历史。此前，彭亨自宋代海丝沿线已经是南海诸邦的海上交通要地，元明代《顺风相送》的歌诀注重以彭亨为编唱主题，华人等待季候风期间，主要聚居在北根市场区域；那个时代彭亨税收主要贸易，是转卖各种丝绸锦缎和陶瓷到邻近各国，交换香料、玳瑁、象牙等物，再运往亚洲东北各地。至少清中叶以前，北根作为彭亨的王城首府，继续是全国内外往来的港口，北根发生的各种变化，都能反映整个彭亨国史的演变过程。但是，彭亨因此也在实质上很早就成为古近代全球经贸历史的一个据点，它从来都是受着全球经贸趋势演变的影响。自西方重商主义兴起注重黄金储备，再到工业革命重视锡的生产和工业上的使用，北根的国际贸易定位也会相随发生变化。这即是说，海上交通和经贸历史的变迁，是会反映在彭亨的本土情境变迁，也会影响着接下去的情境变迁。

^① Census of Pahang, 1891, 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 1892. 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p.2401

^② Kalthum Jeran(ed.), op.cit., hlm. 137.

^③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0页。

矿业虽然在那时成了彭亨主要经济来源，许多基层采矿者是华人，而在各地华人印象中，他们能在当地成群开矿，毕竟是得力于中国各地原来矿源丰富，使得祖辈技术经验也能传承发展，并在彭亨当地落地生根。不过，商业资本总会流向有利可图之处，如果雪柔或暹罗等地，甚至中国大陆发现矿脉，彭亨的华人矿业资本也不一定就要钉在原来土地，和外资竞争。1896年3月，槟榔屿出版的《槟城新报》报道评述“彭亨金矿以西”的成就，说当地新矿区才开始两个月，就出产了近三千两金沙，但文笔最初还是由定论大陆地区“五金矿质，甲于寰区”去说开，顺着讨论彭亨的成就，感叹清朝矿务，嗟叹中土各地不善经营矿区，多有管理不当。^①由此可见，当彭亨经济日趋发展向以矿产收入为主，大清王朝在同时间依旧地大物博，再是不济也依然尚存许多矿区，足于招商引资。那时南洋的华人知识界，批评清朝虽有矿产，管理还得学彭亨，可见清朝不可能是彭亨金属资源的主要购买者，反而南洋华人矿家可能会转回大陆寻找机会。

彭亨东面海洋不会是本邦金属经济的重要出口海域。不过，从英方的角度，西方其时重视金属储备，尤其金矿和锡矿是重要战略资源，主要又是西方需要，英国总督 Frederick Weld 致函给英伦的财政委员会，谈论马来亚东海岸“每年六个月被季候风封锁”，^② 总督主要想着金属国际市场，就不可能像华人过去一贯的关心方向，太去操心帆船与人员要如何在彭亨港口停泊六个月，或者何时可以借用小气候和海潮，去北边暹属诸邦或对岸加里曼丹做买卖。Frederick Weld 的公函更热心讨论如何从彭亨建公路，接通霹雳、雪兰莪、马六甲，尤其是彭亨北半部山地矿区，以确保每逢雨季东部海滨平原的水灾不致于影响北部矿区生产，矿区可以源源不绝把成果运往半岛西岸出口；Frederick Weld 因此还得讨论筹措大笔经费，以维持官僚体系和军警制度，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和加速矿区和种植农业运作。^③

^① 《槟城新报》，1896年3月21日。

^② Lovat, Lady Alice.,op.cit.

^③ Ibid.;pp.393-394.

直到 Frederick Weld 退休前夕，这位总督还在关心着彭亨，告诉他的同僚们说：“彭亨……可能比霹雳和雪兰莪都富庶，有朝一日可能实质性地补偿我们，代替我们因贸易限制而损失在西贡的那部分。在我看来，霹雳和雪兰莪应该建设起道路，去连贯着彭亨的上游流域。在马六甲也该建设铁道，经过 Jelebu 以及南部，直通北根。”^①当然，后人都知道，政策结果如他所愿，具体计划却不是火车直通北根。当 J. P. Rodger 在 1889 年出任第一任参政司，英方从英国殖民部、海峡殖民地政府到参政司，显然都要追随着 Frederick Weld 主张矿区连接西海岸海港的建议，结果他们决定彭亨参政司首府和政府行政都应该北上西进，直接设立在立卑大兴土木，新建各种基础设施，让彭亨矿业成果从此更快速运输至马六甲海峡北方，直接使用槟榔屿自由港出口通往印度洋西进欧洲的航路。1898 年槟榔屿“成记”开始运作，到 1908 年改组为“东方熔锡”，已经是世界最大熔锡工厂，邻近各国锡苗，多是在此地提炼，铸成锡砖，供应全世界。

1889 年立卑开府，也象征着彭亨本土面临西学东渐；自唐宋朝以降，以北根为重心的古老的传统的海洋贸易历史，由此走向终结。以后 20 世纪上半叶的彭亨华人历史，处于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的全球战略当中，长期卷入在列强在亚洲争锋的漩涡，相对于中国从晚清至民国年代的积弱，也经历着从一战到二战的民族觉醒过程，是进入另一种局面了。

本文写作过程，特此感谢挚友刘崇汉、邹永亿相助，提点彭亨地名与父老记忆，并联系得北根拿督陈延明的热心相助，提供当时考古发掘现场和系列碑记相片，协助考据。

^① Cant, R.G., op.cit., p.29.

